王光祈年谱

韩立文　毕兴　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

王光祈年谱

韩立文、毕　兴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

王光祈年谱

韩立文、毕　兴编

*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北京翠微路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延庆延文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2千文字　3.25印张
198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0,635册
书号：8026·4603　定价：1.10元



王光祈在德国



“五四”前后的王光祈

前　言

王光祈，现代中国音乐学的开拓者。用历史的眼光来评价他的成就，在现代音乐史上应该和肖友梅、黄自并列，而在音乐学的领域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

王光祈为人、治学、处世，都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这两个字就是“真诚”。

首先，王光祈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他参加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目的在于救国。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改学音乐，其目的还是在于救国。因为他深信开发民智、振奋国魂要从音乐做起。这虽然可能是受了儒家的“礼乐治国”主张的影响，但他的主张无疑地比儒家大大向前进了一步。

其次，王光祈在政治上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没有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也是一个真诚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他的一些同时代的政客们不同，不是高喊“社会主义”作为沽名钓誉或者作官的敲门砖，而是真诚地相信空想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可能也是受到儒家“大同社会”主张的影响，但无疑他也远远地超过了儒家。

第三，作为音乐学家，他是尊重科学和实践的。有人对他的《中国音乐史》曾经有过不公正的评价，但我们认真地看看他的原书，他以乐律研究为中心，探讨中国乐制的根本问题，通过前人的科学实验，加上自己在艰苦条件下作的补充实验，来阐明中国

历代乐律问题的症结，可以说是第一个用科学实验方法和现代数学计算方法系统整理几千年来中国乐律问题的音乐学家。这一点，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中来考察，也是很难能可贵的。比如他把中国乐制作为世界上独特的乐制来研究，即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也还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我不记得谁说过，本世纪之初，有一个“读书的音乐界”，意思是说：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少音乐爱好者，只有通过读书来自学音乐。在当时，丰子恺的一些著作，通俗地介绍了一些西洋音乐知识，起到了普及音乐知识的巨大作用。与此同时，王光祈的一系列著作，相比之下，在“读书的音乐界”所起的作用，远比前者更为深刻和久远。

过去，在阶级标签满天飞的时日，由于王光祈在早期的政治活动中，曾经和曾琦、左舜生有过来往，并且由于他没有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对于他的学术成果的评价也不够重视和公允。这是我们音乐学界应该引以为训的。

一九八四年六月，第一届“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四川音乐学院召开之后，编选出版了《王光祈研究论文集》。现在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四川音乐学院韩立文、毕兴同志经过几年来广泛收集资料编写成书的《王光祈年谱》。这不仅仅是对中国现代音乐学的开拓者、奠基人王光祈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而且对于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王光祈在政治上走过的道路，吸取其经验教训；研究他在音乐学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继承和发扬他在这一领域中所作的工作，都是有着非常巨大和深远意义的。

赵　沨

一九八五年十月

目　　录

勤于探索，苦斗一生

——介绍著名音乐学家王光祈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二日傍晚时分，著名音乐学家王光祈怀着拳拳爱国之心，在德国波恩，悄悄走完了尚未及满四十四岁的短暂而光辉的人生旅程，和亲爱的祖国永别了！

王光祈是我国“五四”时期颇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是现代中国音乐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为振兴中华，辛勤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艰苦奋斗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尽管，迄今他离开我们已经有五十个春秋，但他在历史上的卓越贡献和功绩，仍是我们永远不能忘却的。

王光祈，字润玙，笔名若愚，出生于清朝正在衰亡的一八九二年，那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多事之秋。他的家乡是四川温江城西的鱼凫镇小河村。童年的王光祈，家道衰落，生活清苦，靠着寡母做手工活和自己放牛割草来贴补家用。在具有传统文化素养的母亲和塾师熏陶下，他很小就知道川人革命前驱者如维新六君子中的刘光第、杨锐，十九岁在上海入西牢而瘐死的邹容，奋不顾身炸良弼的彭家珍等人的革命故事，萌生了强烈的民主爱国意识。

一九〇八年，王光祈在成都第一小学堂高年级就读一年毕业后，考入师资力量雄厚的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从小好学深思

的王光祈，来到天府之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成都府，大大开阔了心胸和眼界。他用功苦读，接受了许多思想开明而博学的良师的培养和影响。在同学中，他从不轻易和人交往，只喜欢结交有学问、有见识的人。如同班同学中的周太玄、李劼人、魏嗣銮、曾琦、郭沫若等，当时与他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常常邀约漫游成都的武侯祠、杜工部草堂、浣花溪、望江楼等名胜古迹，一起议论时事政治，围坐"撞诗钟"，"对神仙对子"，作诗唱和，以抒发自己愤世嫉俗、立志奋飞的思想感情。他们正是一批青春年少，风华正茂的热血男儿。郭沫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这些人在当时都是"同学中的佼佼者"，而王光祈在其中又名列首位①。一九一一年夏秋之际，四川的保路风潮无情地冲击着清王朝在成都的统治，有志青年都在开始探求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出路，都在开始考虑什么是真正的救国救民之道。王光祈在这段时间里，除学习《四书》、《五经》、《唐宋八大家》等大量传统文化外，还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新文化、新思想、新知识。他一方面看到辛亥革命推翻了黑暗腐朽的满清王朝，民主共和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同时也深深痛苦地感到，四川同全国一样，政权由清王朝转到地方政客和军阀手中，封建势力并未彻底打破，天府之国依然民穷财困，巴山蜀水仍在一片黑暗之中，王光祈在"成都兵变"后陷入赤贫的境地，他在衣食交困中挣扎到一九一二年底始毕业于成都府中。素有宏图大志的王光祈，毕业后面临的却是失业、贫困和饥饿的折磨，这使他对中国不彻底的革命，现实的黑暗，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他在痛苦中追求，在求知中探索，决心离开四川，"要彻底打破现状，创造新路子"，朝着理想奋飞！就是在这个革命的转折时期，王光祈已初步具备了民主爱国主义思想。他的挚友李劼人说："大凡他后来那种'打得粗'、

'吃得苦'、'跑得路'、'打落牙齿连血吞'、'咬紧牙关不求人'"的坚强性格和积极进取精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②。

一九一四年，王光祈告别家乡，乘船东下，在飞渡夔门时，触景生情咏诗抒怀，表达自己"千载忧难已，深霄剑自鸣；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的勇气和决心。后从上海到北京，任清史馆书记员。同年秋，考入中国大学专门部法律本科。王光祈在大学学习的四年，正是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四年。他先后任《京华日报》、《四川群报》、《川报》的编辑和记者。还悉心研究《国际公法》和《中西外交史》。这样的环境，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充实了思想。对内忧外患的祖国，对丧权辱国的奇耻大辱，常常忧愤难眠。但他又找不到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常常感到孤掌难鸣，窘迫无计。他曾在一些诗中感叹自己象"枯柳飘蓬"，虽有报国之志，但"落拓都门"，只有"相对欷歔"，仰天长叹了。

王光祈于一九一八年七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在此之前，由于做报纸的编辑工作，他和周太玄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高一涵等人，与他们常有往还。王光祈和周太玄称李大钊为"知心的老大哥"，虚心向李大钊请教，彼此间推心置腹常作深谈，因而受益不少。李大钊对王光祈的印象亦甚好，他说："光祈是一个能想、能行的青年，极有志气"③。是年冬，陈独秀和李大钊发起创办《每周评论》，这是一个密切配合政治斗争和《新青年》互为补充，在"五四"运动的思想准备方面起重要作用的刊物。王光祈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并为创刊号写了《国际社会之改造》的社论。文中热情地欢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这在"五四"运动的前夜，

起到了宣传和推动的作用。此后，他还发表了若干文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军阀的黑暗统治。

"五四"运动时，王光祈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他积极参加了这场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亲自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游行行列。并于当天晚上，热情洋溢地将"五四"运动的长篇通讯写就寄发成都《川报》，这一消息报导，大大促进了四川爱国运动的开展。后来，李劼人在回忆中说："北京'五四'运动之所以及时传到成都，使成都青年得以及时看到这线光明，就不能不归功于王光祈了[④]"。

"五四"运动之后，各种进步刊物和社团纷纷出现，振兴中国，追求民主解放，形成了一股不可抵挡的洪流。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由陈淯、张尚龄、曾琦、李大钊、周太玄、雷宝菁、王光祈等七人发起筹备的著名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正式成立。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王光祈被选为执行部主任，主持学会工作，并负责编辑出版《少年中国》与《少年世界》两种杂志。还亲自介绍了毛泽东、赵世炎、张闻天、恽代英等人入会。学会的活动对当时的思想界、文化界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国外的各种思潮，纷纷传入我国。王光祈这时贪婪地学习着新文化、新思想。他吸收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及"无政府主义"，欧文、圣西门、傅利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和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创建了"工读互助团"。他发表文章，四处奔走，终于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思想文化界名流的支持，联名募捐，筹措经费。北京"工读互助团"终于成立，这在青年知识界中引起了震动，得到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同时，对在国外勤工俭学的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九二〇年二月，毛泽东在北京参观了女子“工读互助团”，很感兴趣。随后即与陈独秀、王光祈等二十六人联名发起“上海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团”之所以名噪一时，受到欢迎，是因为它具有“五四”时代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当时进步青年痛恨旧社会，痛恨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向往光明、美好的社会的反映。

王光祈通过“少年中国学会”、“工读互助团”苦苦探索改造中国的良方。但由于其主观空想性质，及团体内部无法克服的思想分歧和内部斗争，这两个组织相继分裂解散。尽管如此，王光祈在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仍不失为是一个大胆探索者，是一个在历史上不应被忽略的人物。

“工读互助团”的解体，使王光祈的内心很痛苦，他决心远涉重洋，到当时正致力于战后复兴的德国去考察、学习，以获得较有系统的学问，以学术上的奋斗，来继续实现“少年中国”的理想。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他以《晨报》、《申报》和《时事新报》特约通讯记者身份，与魏嗣銮等由吴淞启航赴欧，于六月初抵达德国的法兰克福。

到达德国，是王光祈新生活的开端，也是他在学业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他加强补习德文，攻读政治经济学，并利用晚上时间与魏嗣銮一起翻译德国各大报纸的重要新闻分寄回国。同时，还为国内各报刊杂志撰稿。在德初期，他完全靠稿费收入维持生活。

王光祈赴德不到三年，即放弃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改学音乐。在一九二七年进入柏林大学音乐系深造以前的短短四年中，已经在国内发表出版了《德国人之音乐生活》、《欧洲音乐进化

论》、《东西乐制之研究》等十二种有关音乐的著述，显示出他在音乐学研究方面的才能，引起国内音乐界的瞩目，也使得反对他改习音乐的朋友们感到意外和惊讶。

王光祈改习音乐，是受到爱国心的激励和驱使的。当他在德国实地看到欧洲国民对于音乐的热情，“以至非有音乐不能生活的境地”，因而得到启发，认为要改造中国，即应先行改造人心，而改造人心，就必须从恢复“礼乐”开始。王光祈十分尊崇孔子，尊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礼乐”观。王光祈认为“礼乐”与中华民族的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礼乐’不兴，则中国必亡”。他十分重视音乐的社会功用。认为音乐是“最足引起‘民族自觉’之心”，具有“陶铸‘民族独立思想’之功”⑤的艺术，特别强调“音乐化人”、“寓教于乐”。他表示自己从事音乐的目的，正在于“欲借此以唤醒‘中华民族本性’，为抵抗外国文化侵略之工具”⑥。王光祈的这些观点，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儒家“礼乐观”的继承和发展。他热情洋溢地宣称：“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从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因此之故，慨然有志于音乐之业”⑦。王光祈就是这样抱着用“音乐再造中华民族”的宏图大志，以“焦头烂额死而无悔”的决心，开始他从事音乐研究的学术生涯。他先后师从霍恩博斯特尔、舍尔林、沃尔夫、萨克斯和席德迈尔等教授。由于刻苦钻研，用力至勤，王光祈在音乐学研究、特别是在音乐史学方面获得了较高的造诣和成就。

王光祈旅德期间，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所受到的歧视，有着切肤之痛。他在德国虽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但却怀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始终立足于自己祖国的民族音乐。他身处异国，在中国音乐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仍毅然从事整理、研

究和总结祖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工作。他在《中国音乐史》这部专著中，对中国音乐的乐律、调式、乐器、乐队、诗乐、器乐以及音乐思想等均作了归纳和整理。特别是对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律学发展作了比较系统的叙述和探索性研究。他还另作短史，向欧洲人介绍中国音乐发展的概况，充分表现了他的民族自豪感。王光祈所做的这些工作是他理想的第一步，即：以促进创造“引起民族自觉心”的“伟大国乐”。这样的国乐，即是他在《欧洲音乐进化论》一书中所指出的：“要建筑在吾国古代音乐与现今民间谣曲上面”的。因为，他认为“这两种东西，是我们‘民族之声’”。既然，音乐作品须建筑于“民族性”之上，那末音乐艺术就决不可以象引进其他科学技术那样照搬西洋的一套，决不能“以西乐代庖”，更不能依靠那些“黄面黑发”的“洋音乐家”，而必须在传统音乐的基础上进行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他主张一面先行整理、学习我国的古代音乐遗产，一面辛勤搜集民族民间音乐，然后再运用西洋音乐的科学方法，创造出一种具有民族性的新音乐。这种新音乐能够参加世界音乐之林，与西洋音乐成一个对立形势，并使之“跻于国际乐界而无愧”。王光祈渴望祖国独立富强，他的深沉的爱国主义和炽烈的民族感情融铸在音乐研究之中。

但是，王光祈在音乐研究中的一些观点也是带有局限性的，如他认为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无识”、“无业”，在性格上存在缺点。因此，他主张普及教育和发展实业可以治疗社会弊病，再就是利用西洋的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用以唤起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完成我们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不是通过革命斗争，从根本上改造社会，而是想用改良的方法去改造社会；他把音乐置于单纯的伦理道德范畴，过分强

调了音乐作为教化的手段，不适当地夸大了音乐的社会功能，认为音乐可以“立国”、“兴邦”等等，企图借助音乐的手段，实现他那梦寐以求的理想王国——“少年中国”，这也就不能不陷入空想的泥沼，不能够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他的思想没有能够超出民主主义思想范畴。王光祈致力于音乐学研究，是在六十年前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他从时代、社会和自身的需要出发来积极探索复兴祖国的新路时，他的探索和研究是基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要求，他一直未能跨越空想社会主义的范畴，没有能够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因此，他的一些主张和观点，无疑地带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性，这也是应当加以认识和舍弃的。

王光祈从事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很广。他从一九二三年改习音乐开始，通过译著编选有关著作，坚持比较全面、系统地向国内介绍西方音乐文化；一方面介绍西方各国人民的音乐活动状况，一方面介绍音乐科学与作曲理论。这些著作的出版，对于音乐知识相当贫乏和眼界比较闭塞的二、三十年代的国内青年，是具有启蒙意义的，促进了当时国内青年对西欧音乐文化的学习和了解。他还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撰写了《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等著作，向国内介绍了二十年代在德国也属于新兴科学的比较音乐学，对我国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从一九二六年起，王光祈又开始将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介绍到西方。他先后在德国发表了用德文写成的介绍中国音乐文化的文章和专著，还为《大英百科全书》、《意大利百科全书》的重新修订撰写了有关中国音乐的条目。一九三四年，他以《论中国古典歌剧》的论文获得波恩大学博士学位，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早在欧洲为祖国争得荣誉的音乐学家，也是我国最早获

得世界承认和肯定的音乐学家。王光祈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其他领域也做了大量工作。早在一九二一年，他就与魏时珍、宗白华等人发起组织留德学生“中德文化研究会”，其宗旨即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中德两国民族的同情和了解。

王光祈在留德期间生活相当艰苦。他曾说自己“是一个极穷的小子，未曾受过家庭一文的遗产，也未用过官厅一文的公费”，他的生活来源是依靠半工半读。他非常勤奋，治学严谨，主张研究问题要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不惜以毕生之精力从事”。他往往为研究一个问题，查阅一条资料，翻译一个名词或几首古谱而在图书馆里耗费数月心血。他在《中国音乐史》一书自序中说：“余留德十余年，皆系卖文为话，自食其力，即本书一点成绩，亦系十年来孤苦奋斗之结果”。王光祈旅德专习音乐仅只十三年，但其论著竟达三十四种之多，国内正式出版的就有近二十种。他在音乐史学、音乐美学和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面作出了诸多贡献。作为一个前驱者，他做了不少探索性的工作。此外，他“以译著事业，报效祖国”，利用业余时间编译了中国近代外交史料七册，《国防丛书》一套，以备国人参考，这亦属于爱国的举动。他作为记者撰写了数百篇通讯文稿。由于过度勤奋于研究著述，他患有胃溃疡、贫血病和头痛症，竟数次昏倒在图书馆，终至脑溢血突发，客死波恩。王光祈清贫一世，孑然一身，始终怀着对祖国的赤诚，在海外孤苦奋斗十六年，坚持他的学术生涯。

王光祈的一生，是和祖国民族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一个热诚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名字和著作，在当时曾影响了许多青年走向社会和从事音乐，其影响也远及海外。他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述，是我们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延安时，曾对王光祈的业绩作了高度评价。他说：“我们不能忘

记一位埋头苦干死于柏林（波恩之误）的中国音乐理论家王光祈，他遗下给我们许多宝贵的著作和翻译，推进了新音乐运动的发展。他的刻苦耐劳是我们从事中国新音乐的模范”[8]。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吕骥为《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书写了“王光祈的全部音乐论著都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辉”的题词，四川老革命家张秀熟为建立在四川音乐学院的“王光祈墓碑亭”撰写了“革命先驱，少年中国；蜚声环宇，音乐名家”的楹联，这些都是对王光祈的光辉而短暂的一生的最好评价。

注　释：

① 郭沫若：《少年时代》。

② 李劼人：《诗人之孙》，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③ 傅斯年：《追忆王光祈先生》，载《王光祈先生纪念册》，文海出版社。

④ 李劼人：《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所由成立》，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⑤ 王光祈：《中国音乐史》（自序）。

⑥ 王光祈：《国人能力破产之可惊》，载《醒狮》三十二号。

⑦ 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自序）。

⑧ 冼星海：《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

王光祈年谱

（一八九二年十月五日至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二日）

说　明

一、本年谱简要地记载了王光祈的社会经历及著译活动。当时国内外大事，除与谱主有直接关系者外，一般从略。

二、年谱中记载的社会活动及著述，凡涉及王光祈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的主导方面，皆略作提要式的话明。一般不具体介绍。

三、年谱中的著译，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写作时间不详的按发表时间编入。日子不详的编入本月月末；月日不详的编入本年年末。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一八九二年

十月五日（旧历八月十五日）出生于四川省温江县城西门外鱼凫镇小河村。

其祖籍原在湖南。高祖王宏信，约在清朝乾隆年间经商（铸锅业）入川，始定籍温江。



《温江县乡土志》①

祖父王再咸，字泽山，能诗善文。清代咸丰壬子科举人。后两次进京会试未第，滞留北京教馆，过着寄人篱下的教书生活。曾作过后来相继出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赵尔丰两兄弟的受业老师。五十二岁，卒于北京。著有《泽山诗钞》二卷。

父亲王展松，字茂生（或梦生），本县秀才。曾在清政府内阁供职，后弃职回家经营锅厂。在王光祈出生前两个月，客死隆昌旅次。

光祈是王家的独生子，出生时家道衰落，家庭生活陷于困境。仰仗孀母劳动和叔伯们不时接济，勉强度日。

一八九七年（五岁）

光祈的母亲罗氏，出身"书香门第"，知文能诗，是一位具有封建文化素养的妇女。光祈五岁时，母亲便教他识字念诗。光祈秉性聪慧，有很强的记忆力，一经教读，便能琅琅上口，经久

不忘。母亲十分钟爱。

一九〇〇年（八岁）

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光祈帮附近农家放牛。这时，他已经跟母亲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孝经》以及《唐诗三百首》等书，并且能够对联语，一次其母戏出“以天下为己任”，王光祈脱口而出，对以“视富贵如浮云”②。

一九〇一年（九岁）

其母卖掉家里仅有的几亩园林和院落，迁居县城西门外麻市街，并送光祈到相距不远的三官庙侧一所私塾上学。

塾师蒋春帆，是一位饱学之士，推崇康有为、梁启超诸人，常向学生讲述维新六君子的故事，川人刘光弟、杨锐慷慨就义的事迹，在童年时代王光祈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蒋春帆老师出“观今鉴古”一联，王光祈立即对出“除旧布新”，老师十分满意③。

一九〇七年（十五岁）

是年，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通过查访，得知光祈母子生活拮据，度日艰难。赵念及王再咸教诲之恩，将光祈母子接到成都相见。并从四十八家当铺罚款中，指拨纹银一千两，存入东、南门两家最大的典当商铺生息，每年可支息银四十余两，供他们母子生活。

由于这一偶然的机缘，王光祈才得以离开温江，于当年以同等学历进入胡雨岚创办的成都第一小学堂高年级。赵尔巽命他每周交一篇作文，“亲自给他改削，同时并给他报捐了一个同知衔

程”④。

一九〇八年（十六岁）

王光祈考入成都有名的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与郭沫若、李劼人、周太玄、魏嗣銮、蒙文通、曾琦等先后同班。

这是一所旧制五年制中学。当时的“一代名流”如刘士志、王铭新、杨沧白、刘咸荥等，先后在该校任教。他们热心提倡新学，秘密在学生中鼓吹“排满兴汉”，倡导学生阅读鼓吹改革、宣传推翻满清的《新民丛刊》、《民报》、《神州日报》、《民呼报》以及严复的《天演论》等进步书刊。教导学生要“薄于自奉”，“勇于治学”。

王光祈在良师的栽培下，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新文化、新思想、新知识。他学习努力，思想活跃，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在这个时期，他奠定了民主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

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一书中，记述了他们当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学习生活，称王光祈是“同学中的佼佼者”。

一九〇九年（十七岁）

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虽然有以校长刘士志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提倡新 ，鼓吹改革；但也有以新任监督（即校长）都敬阶（绰号“都喇嘛”）为代表的守旧派，坚持传统的教育方法、效忠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王光祈对学校设置的那些禁锢思想、旨在复旧的课程和管理方法极为蔑视。事为都敬阶所知，在第二年开学时，以“桀骜不驯”为由，不准他和另一同学魏嗣銮住校。后经多次说情疏通，学校才撤销了这一决定。

一九一〇年（十八岁）

在其母包办下，与罗次玙结婚。

罗次玙比光祈小一岁，温江镇子乡人。知书识礼，温柔贤淑。且长于刺绣，善于操持家务，婚后夫妻感情尚好。

一九一一年（十九岁）

夏秋之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王光祈以高昂的热情投入了保路运动的洪流，和同学们一起听四川省谘议局副议长、四川保路同志会副会长罗纶激动人心的演讲，高唱《保路歌》参加了罢课和游行的行列。十月十日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来，王光祈立刻剪掉了自己头上象征腐朽落后和屈辱的辫子，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希望。

是年，罗次玙生一子，数月后夭殇。

一九一二年（二十岁）

是年三月，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由于经济困难而停办，原丙、丁两班，合并到成都府中。王光祈也随之进入该校，编入第九班即新乙班学习（见《石室纪事》）⑤。

辛亥革命后，由于成都兵变，藩库、商行、当铺及大小公馆，一夜之间被叛兵、土匪、流氓纵火焚烧，洗劫一空。这场浩劫，断绝了王光祈一家赖以生活的四十两息银的来源，使他顿时陷入赤贫境地。在衣食交困中，他挣扎到当年十二月，毕业于成都府中（见《石室纪事》）⑥。

李劼人在《诗人之孙》一文中说："大凡他后来那种'打得粗'、'吃得苦'、'跑得路'、'打落牙齿连血吞'、'咬紧牙关不

求人'的精神，就是在这时节养成的。”

一九一三年（二十一岁）

春，在重庆与曾琦、郭步陶、宋小宋等人编辑《民国新报》，意图一展抱负。辛亥革命后，四川政局混乱，他思想也很苦闷，常和报社同人，作诗消遣，曾作有清明词三十首。不久，报馆关门，他又到成都一家无聊的报社作主笔，空暇时间，常和李劼人一道在少城公园相对闷坐，连说笑的兴致也没有了。由于他不愿“随波逐流的鬼混”[7]，没有多久，他便挟起小包裹，回到他的家乡温江。

王光祈回忆这一段生活时说：“我家里又经成都兵变，家产荡然，搬到乡间一个顶坏的房子居住，我的母亲又在病中，当时受了孔方兄的压迫，真是实行不用仆役主义，我自己烧饭、炒菜。……而且一面烧饭，一面读书，竟读完了陶、谢、王、孟、韦、柳各家的专集，还看了许多经史的书籍”[8]。这一段时间的潜心钻研，为他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在温江，他和赵君凯、崔干臣、彭云生等经常往还，或作诗唱和，或纵论国事。光祈的诗才、辩才，常为同辈倾慕。曾远侯在给许孟余的信中曾用这样的句子“润玙旧相识，遣调潘陆美”来赞美王光祈[9]。

他的母亲由于长期劳苦忧虑，于是年病逝。一岁半的女儿，也在当年死于天花。

一九一四年（二十二岁）

春，李劼人的舅父宦任泸县知事。李劼人任秘书兼文牍科

长。王光祈到泸州李劼人处小住，筹措赴京旅费。

在泸州他致函在上海读书的周太玄，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表露了许多惊人而可宝贵的见解。结论是“要彻底地打破现状，创造新路子”⑩。

春末，赴重庆，乘船东下，飞渡夔门。沿途触景生情，写下了《夔州杂诗》六首，描写了故乡人民的苦难，倾吐了自己心中的抑郁和不平：

（一）

今夜孤城外，悲风战马嘶，
猿声过峡断，人语入舟低。
蜀道仍荆棘，秦军自鼓鼙，
居民苦行役，闭户水东西。

（二）

白帝城边树，春来处处深，
征吴存大义，入蜀系天心。
髀肉今难抚，夔巫日又沉；
遥怜东逝水，终古尚阴阴。

（三）

万里瞿塘水，滔滔怒不平。
中原还逐鹿，竖子竟成名；
千载忧难已，深宵剑自鸣，
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

（四）

不知云外路，已作峡中人，
水落鼋鼍怒，风微日月真。
野花迷古渡，幽草送残春，

独有青城客，劳劳滞此身。

（五）

两崖如壁立，一线漏青天，
乔木临风倒，苍藤带雨悬。
乾坤浮不老，云雾暗相连，
祗合同僧住，时携买酒钱。

（六）

雷声才着壁，风已过夔门，
四面奇峰乱，千年怪石尊。
江湖如有讬，舟楫漫招魂，
无限浮生事，凄凉未忍论⑪。

当他辗转到达上海吴淞车站时，他的朋友几乎不敢相信。魏嗣銮回忆王光祈到上海的情景是："一身破旧衣裳，一个脸盆，一部杜诗，布鞋后跟烂得象鱼尾巴一样拖起了。"⑫

其后，他到青岛，复回上海再至北京。在赵尔巽（时任清史馆总裁）的帮助下，到清史馆任书记员。月薪八元，后升为三十元。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赴德留学时为止。

是年夏秋之间，写《寄内》（七律），表达了"万里依人计已非，百年出没寸心违"的寄人篱下的失意心情。

秋，考入北京中国大学专门部法律本科。着重研究《国际公法》和《中西外交史》，寓居北池子一间狭陋不堪的小屋，过着半工半读的艰苦生活。

一九一五年（二十三岁）

王光祈继续在北京中国大学专门部法律本科学习，并趁在清史馆工作之便，接触了大量清政府与各国所订的条约。他潜心披

阅、研究，为后来从事社会活动及有关近代历史和近代外交方面的著译事业打下基础。

夜晚到青年会补习英语。

是年秋，袁世凯大造帝制舆论，准备复辟称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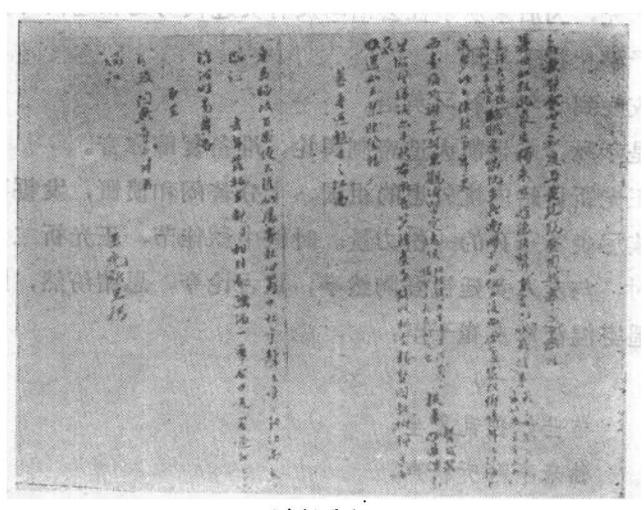
王光祈目睹内忧外患的祖国，十分苦闷和愤慨，发誓要为国家民族尽炎黄子孙的一份力量。时值中秋佳节，王光祈二十三岁生辰时，与友人黄廷锐登陶然亭，议古论今，思绪纷然，赋诗二首，遥寄温江挚友崔干臣：

（一）

举世如狂乱象生，
独来亭畔听秋声，
直言已愧苏推事，
临眺应怜阮步兵。
南国干戈他日泪，
西风芦荻故乡情。
年年江海都成梦，
此日休疑节序更。

（二）

西台痛哭谢皋羽，
东观淹留定远侯。
投笔声威闻万里，
临风涕泪亦千秋。
布衣常笑轻秦帝，
残照相看类楚囚。
枯柳飘蓬无限意，
还如王粲赋登楼[13]。附图



王光祈手迹

全诗铿锵有力，既表达了对班超、谢翱(谢皋羽)爱国精神的崇敬和为国效力的宏图壮志，也流露出了一些对黑暗现实无能为力的忧愤情绪。

他的生活仍十分俭朴。这一年冬天，他每日生活费仅用四个铜元。早晚两餐均在极便宜的饭摊上与一般人力车夫一样，啃一个铜元的窝窝头，半个铜元的小米粥，半个铜元的小菜。后来他对恽代英回忆这段穷苦生活时说："如是者两月，我才晓得在号称生活昂贵之北京，每月有一两元的生活费，亦可以过活⑭。

一九一六年(二十四岁)

由四川《群报》主笔李劼人介绍，王光祈兼任《群报》驻京通讯记者。他每天向成都寄剪报、发消息，从事反袁护国斗争和介绍新思想、新文化的活动。李劼人回忆说：他所写的"反袁世凯帝制和反张勋复辟的消息和文章又快又多而又有力"⑮。从残

留的几份《群报》中，可以证明李劼人的回忆，是十分准确的，如：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　王光祈自北京发回三电：一是《张勋干涉议会之又一电》，二是《张勋干涉国会之又一由》，三是揭露张勋干涉国会的反响和危害。指出："张绍轩竟以此通电攻击国会，张作霖、赵倜亦附和发言，曾无丝毫尊重爱护立法机关之意，军人骄蹇如是，诚可谓宪政前途不胜危惧者矣！"

九月二十五日　北京专电：《冯国璋劝告张勋》。

九月二十九日　北京消息：《王宗尧请宣示二张情事》，指出："张勋攻击新国务员司法总长张跃曾，而政府与议员均连带侮辱。""王宗尧奋起致电总统，责备张勋代表大多数国民"，指出"张督军借题发挥，无理取闹，公然以毁法自任。"

是年秋　周太玄由上海至北京，任《京华日报》编辑，经周推荐，王光祈也到该报任编辑工作。两人同在一个报馆，经常工作到深夜，理想和报负便成为这时倾心交谈的主题。他们深感"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决心"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他们决定：首先，要坚持发扬志气，艰苦奋斗，绝不同流合污，得过且过。其次，一定要奋勇向前，为国家民族找出一条道路。第三，只依靠少数人的一点友谊还不够，必须扩大圈子，使有为的青年都能团结在一起。他们还设想，要有一个不单在学问方面，还要在事业方面共同奋斗的团体。他们把以上这些想法，以通信的方式和在东京留学的陈淯、曾琦、雷宝菁等进行讨论[16]。

王光祈这时正醉心于国际外交的研究，有一次，他得到稿费二十元，按理应寄给乡居的妻子，但是，经过一夜寻思，他毅然

决定买了一部商务出版的《外交月报》全份。

一九一七年(二十五岁)

春　《京华日报》停办，周太玄到北京《中华新报》工作。王光祈继续在清史馆任职，并兼任成都《群报》驻京记者。

五月　四川泸县陈淯（愚生）从日本回国他和王光祈早有书信往还，北京会面后十分高兴，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砥砺品行，探讨国家前途。

夏　由于报纸编辑工作的关系，也由于陈淯的介绍，王光祈和周太玄结识了李大钊（李大钊于一九一六年六月自日本返京后，担任《晨钟报》主编，九月辞职。一九一七年一月，担任《甲寅》日刊编辑），彼此十分投契。李大钊年长王光祈三岁，思想成熟，气魄宏大，为人谦和，有长者风度。在交往中，王光祈、周太玄十分敬重李大钊。李大钊虽然工作异常忙碌，但对和王光祈、周太玄接谈却十分重视。每次约集，一定早到，而且谈话不限时间。曾有两次谈到深夜两、三点钟。周太玄回忆说："由于他(李大钊)这种感召力，又由于他对这种结合的认真和虚心，很快我们便把他当作一个知心的老大哥，真是相见恨晚。"⑰

七月　张勋、康有为拥溥仪复辟。段琪瑞向北京发起进攻，讨伐张、康，张勋失败逃跑，段琪瑞入京重新执政。这一段时间，王光祈积极向成都发专电，写通讯，揭露张勋复辟的丑剧。

八月　(旧历七月七日)七夕之夜，王光祈邀彭云生、周太玄夜游陶然亭，吟诗二首：

(一)

客舍浑如梦，深闺漏更长。

百年一弹指，千里九回肠。

蟾影中天静，虫声咏夜凉。
西风吹白露，秋意已茫茫。

（二）

细检平生事，无如此日闲。
秋心疏柳外，归思远峰间。
玉笛时鸣咽，孤云自往还。
乐忧都一瞬，饱食且看山⑱。

从诗中可以看出，王光祈在动荡、混乱的军阀统治下，找不到出路，心情黯淡、情绪低沉。

十一月、十二月　上海《民国日报》、《申报》、《东方杂志》等均开始报导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王光祈密切注视有关报刊介绍的情况和文章。

一九一八年（二十六岁）

一月　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大量增购宣传和介绍新文化、新思想的书刊，把北大图书馆办成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王光祈、周太玄经常到这里阅读书报，吸吮新的知识，并向李大钊请教。李大钊常对人说："光祈是一个能想、能行的青年，极有志气"⑲。

五月至六月　我国留日学生因反对北京军阀政府国务总理段琪瑞与日本秘密签订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罢学，先后归国者达三千人。雷宝菁（眉生）、张尚龄（梦九）等从日本回到北京。王光祈常邀周太玄、陈淯、雷宝菁、张尚龄等在南池子陈淯的住址或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商榷"出处进退"，谋求救国之道。王光祈初步提出了建立"少年中国学会"的设想，并草拟了学会规约大纲数十条。

六月二十五日　曾琦（慕韩）自日罢学归国，在京与王光祈会晤。王光祈认为，曾琦等人在留日学生中倡导罢学运动，声势虽大，但多感情用事，以此而言救国，则办法未免简单。他对曾琦说："我们皆在青年求学时期，救国最好在早做基础的准备工夫，而准备工夫不外两事：一为人才，二为办法。但人才已不能求之于已成势力中，则应早日集结有志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经过历练，成为各项专门人才，始足以言救国与建国的种种实际问题的解决。至于办法，也非浅识玄想，东想西抄便可以适合国家真正需要。因此，必须每个同志都去增进自己的学识，从事各种研究。而今日之研究学术，又必须本科学的精神，方不致流于空疏[20]"。此议得到曾琦的赞赏，于是遂商议发起创建"少年中国学会"事宜。

在讨论学会的宗旨时，曾琦坚持要以"少年意大利党"为模式。王光祈认为："十九世纪之'少年意大利党'、'少年德意志党'所创造之'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在当时视为少年者，在今日吾人视之，亦老大意大利，老大德意志而已。""吾人所创造非十九世纪、十八世纪之'少年中国'，实为适合二十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也[21]"。由于王光祈和曾琦私交甚好，虽然互有争执，但多采取细谈的方式求得一致的结论。

六月二十六至六月二十九日　王光祈会同曾琦、周太玄、张尚龄、陈淯、雷宝菁等六人，讨论修改由他起草的"少年中国学会"意见书，即《吾党今后进行意见书》，意见书提出："同人等欲集合全国有为青年，从事专门学术，献身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知改革社会之难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奋斗，继之以实践；知养成实力之需时而不可以无术也，故持之以坚忍，而终之以俭朴。务使全国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风，

常怀改革社会之志，循序以进，悬的以趋。勿为无意识之牺牲，宜作有秩序的奋斗㉒。”

王光祈起草的这份意见书，代表了当时一批青年志士的救国理想，是“少年中国学会”建会的理论基础。

六月三十日下午　王光祈与周太玄去曾琦住处，并约同陈淯、张尚龄、雷宝菁共六人，在顺治门外南横街岳云别墅张文达祠，商议正式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公推王光祈为起草员，草拟规约章程，组织筹备处，为郑重起见，筹备期预定为一年。

夏　四川《群报》被封，成都昌福印刷公司又约请李劼人另行主办《川报》，王光祈受聘担任《川报》驻京记者。除每天寄剪报、发专电外，每周至少写通讯报道一至二篇。李劼人说：“他的通讯写得很好，解剖当前时事，既透辟而又颇有见解，深受读者欢迎。”㉓

七月八日　王光祈以优异成绩（第二名）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并从北池子移寓南池子磁器库八号。与北京大学的林德扬、黄秉礼、郭有守同住。房子由后门出入，狭陋不堪。因无门牌，故钉一木牌，题名“蓬庐”以示之。李大钊、陈独秀、高一涵等经常来这里与王光祈晤谈。

七月十二日晚　王光祈邀约周太玄、曾琦、陈淯、张尚龄、雷宝菁等，在中央公园继续讨论他起草的“少年中国学会”规约，至十时始散。

七月十四日晨　王光祈、周太玄在南横街岳云别墅与曾琦、陈淯、张尚龄、雷宝菁继续讨论有关事宜。

七月二十一日午后　王光祈、周太玄同去曾琦寓所，抄写“少年中国学会”章程，并邀请李大钊前来指导，纵谈至晚十时始散。

经过这一段时间数次商讨，“少年中国学会”规约七十条全部制定。列名发起人为陈淯、张尚龄、曾琦、李大钊、周太玄、雷宝菁、王光祈。大家一致推举王光祈为“少年中国学会”筹备处主任兼会计，周太玄任文牍，李大钊为临时编辑部主任。并决定与李大钊“商榷一切”。自此以后，王光祈精神抖擞，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贡献于筹备组织和发展会员工作。

九月五日　在《时事新报》副刊发表《学生赴欧参战队进行手续之商榷》

十月　毛泽东经杨昌济教授介绍，到北大图书馆与李大钊会见，并在图书馆工作了四个多月。通过李大钊的关系，王光祈结识了毛泽东。

冬　李璜从上海至北京办理赴法留学手续，他以“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身份并持有魏时珍的介绍信，到南池子会见王光祈。由于李既是会友，又是四川同乡，王光祈接待格外热情。当即偕李璜会见李大钊和陈淯。安排李璜在李大钊家暂住一宿。次日又带李璜搬迁至陈淯家。第三天，李大钊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约请部份“少中”会员吃烤鸭。先到者有陈淯、李璜、邓中夏、易克嶷。王光祈因去约请毛泽东、赵世炎与李璜交谈赴法留学事，最后才匆匆赶到。席间，王光祈严肃地对李璜说：“今日政治黑暗，社会腐败，我们青年此刻虽无如之何，但应集合有志者，树立风范，徐图进展。‘少中’所以标出坚忍、奋斗、实践、俭朴四大立身标准，其意在个人生活有别于旧社会，然后始能言改革旧社会，而有所创造也……”在王光祈谈风正浓时，毛泽东、赵世炎到来。王光祈向李璜介绍说：“两友有意赴法求学，闻你将往，愿一谈。”

由于赴法船期尚有两月，李璜应李石曾之请，在留法预备学

校讲初级法文。毛泽东、赵世炎也前去听讲。王光祈因忙于事务，间日会面一次。王光祈曾对李璜讲，他将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李璜曾担心无工可做，王光祈笑曰：“两个子儿一件衣裳总可揽来洗也”。㉔

十一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英、美、法等战胜国宣布于次年一月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

十二月二十二日　陈独秀、李大钊发起创办《每周评论》。这是一个密切配合政治斗争和《新青年》互为补充、在“五四”运动的思想准备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刊物。王光祈是该刊主要撰稿人之一。他为创刊号写了社论《国际社会之改造》。在文章中，他热情地欢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无情地揭露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的虚伪性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文章也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想，比如主张打破国界、人种偏见、打破现状、扫除资本家、军阀、贵族的权威，建立一个由各地方自治团体联合起来的理想社会。

一九一九年（二十七岁）

一月十二日　在《每周评论》第四号发表《无职业的人不得干预政治》。

一月十八日　巴黎和会开幕，这次会议很快就暴露了帝国主义国家强盗分赃的性质。

一月二十一日　由于周太玄、李璜即将赴法留学，上海会员电邀王光祈赴沪，筹商会务。王光祈于是日抵沪。

一月二十三日　上海会员在吴淞同济学校举行了吴淞会议（筹备会），王光祈任会议主席。他在会上详细地阐明了学会宗旨。

在讨论学会的主义信仰问题时，王光祈认为："现在同人研究学问，思想极宜自由，主义亦不必一致，将来大家切实研究之后，有决定之必要时，再为讨论决定。"到会者一致赞成不必统一会员的主义信仰。会议还讨论了"印刷局办法"，通过了"印刷储金简章"；同时欢送周太玄、李璜赴法留学。

二月初　由沪返京，取道金陵，曾与左舜生会晤，讨论"小组织"问题。并在游览了莫愁湖风光后，返京。

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日　在《晨报》副刊发表《择业》。文章说："二十世纪是社会主义盛行的时代，是讲究全国皆工，要是终日坐在家里毫不做事，……仗着自己的金钱，掳夺他人的生产，那就完全是强盗行为了。"他提出择业的标准，是要为"大多数人谋幸福"，不能"有害他人"。

二月二十三日　在《每周评论》第十号发表《国际的革命》。文章指出："协约国联合起来，攻打德国"，"不能叫做国际革命"。因为战争结果，"强权既未打倒，自由亦未获得"。"国际社会党的活动，最大目的就在求人类大多数的幸福。他们所最恨的就是强权。只要是强权，不问国界、人种、宗教、语言、文字的分别；都要去革他的命。他们所最爱的就是自由，只要是自由，不问他是强、弱、大、小的民族，都要去帮忙的。"

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在《晨报》副刊发表《学生与劳动》。文章认为"现在是二十世纪劳动主义盛行的时代，只吃不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提倡'一面工作，一面读书；终身工作，终身读书"。认为这样做可以"养成独立生活"；"熟悉社会情况"；"养成耐劳习惯"；"养成强壮身体"。

三月一日　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一期，发表《复赵世炯（子章）》。主张"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各尽所能，各去

所短”。“会员性情有偏重于学术者，则尽力发挥他的本领去研究学问。有偏重事业者，则尽力发挥他的本能向事业方面发展”。

三月一日至二日　在《晨报》副刊发表《俄罗斯之研究》。文章对上海某报登载俄国实行“妇女国有”的荒谬消息进行了批判。文章建议发起“俄罗斯研究会”，搜集材料，用“正确的眼光，作有系统的记载”。

三月二日　在《每周评论》第十一号发表《今日之梅湼特》。文章讽刺了在巴黎和会上“很出风头”的邱吉尔。指出他想走十九世纪初期奥国首相梅湼特的老路，组织新的“神圣同盟”，扑灭世界革命。文章结束语说：“列位要知道他的将来，就请看梅湼特的过去。”

三月十六日　在《每周评论》第十三号发表《兑现》。文章揭露巴黎和会“全是五强国的世界，什么叫做永久和平，不过是一张不兑现的支票罢了。”

三月二十三日，由邓中夏等人发起正式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王光祈是讲演团最早一批成员之一。

三月二十七日　在《晨报》副刊发表《朝鲜革命与外蒙骚乱》。文章认为，欧战以来，“民族自决主义的潮流，已经流到东亚。”朝鲜是自动的革命”，“为爱自由而流血，因争自治而牺牲，在人类进化史上，添了许多光彩。”“外蒙是被动的骚乱”；“受了别人的愚弄，做了他国的机械，糊里糊涂，盲动一阵”；“脱离甲国的统治，而入于乙国的羁绊”；“是损坏民族自决的好招牌。”

四月四日下午　出席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东便门内蟠桃宫举行的演讲会。发表了《什么是“善”》的演讲。他认为对“公众有利益”的事，“就是善的、好的”，也就是

“我们应该做的”。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为“少数人快活”，“就是不好的”，是“我们应该反对的”。据载：“是时，黄沙满天，不堪张目，而其听讲者之踊跃，实出乎意料之外。”演讲的内容后整理成文，连载于四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的《晨报》副刊。

四月十五日　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四期发表《工作与人生》。文章认为，工作就是“以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于人的事业。”批判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提出“为共同生活而工作，以创造未来之世界。”

四月二十日　在《每周评论》第十八号发表《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文章除介绍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外，较为客观地、概略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四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　在《晨报》副刊发表《读梁乔山先生与某君论社会主义书》。文章除谈到他对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解外，还提到社会主义“强大的国家权力，究竟与个人自由有无妨碍？”希望讨论解决。

五月一日　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三期发表《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文中提出：“本会同人因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吾人最终目的，即为创造‘少年中国’”。“故‘少年中国学会’者，中华民国青年活动之团体也。”

同日　在《晨报》副刊发表《劳动者的权力》。文章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历史。指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事就是：“田主、资本家终日快活”，“雇我们劳动者替他们做奴隶、做牛马”。“我们劳动者终日辛苦所得的生产物，都被他们掳夺去了”。文章提出，劳动者“应该抱定宗旨，挺起身来”，“要求生产机关

（如土地、机器）应归公有，要求教育平等”，不达目的，“决不甘休”。

五月三日　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四期发表《致慕韩（曾琦）信》。

同日　在《晨报》副刊发表《社会主义的派别》。文章介绍了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异同，对无政府主义介绍尤为详细。

五月四日　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操纵下，通过了由日本接替德国在我国山东权益的决定，激起了我国广大群众的愤怒。北京学生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巴黎和约签字”、“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游行群众放火烧掉了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匿身曹宅的章宗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爆发了。

王光祈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游行行列。当天下午即将游行情况，专电发回成都。晚上，他又满怀革命激情为《川报》写了一篇富有鼓动性的通讯。此后，他密切注视运动的发展，不断地向成都发消息，有时一天连发两三封通讯。张秀熟回忆说，这一阶段他写回的通讯和文章，总共约有五十余篇㉕。

五月七日　成都《川报》在简要新闻栏用大字刊出王光祈发来的关于“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

五月十一日　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一号发表《为青岛问题敬告协约各国》。文章提出：“欧洲此次和会，高唱民族自决主义，所有欧战以前一切不自然的处置，皆应本诸民族自决主义、民主主义的精神，为公平的改正，谋永久的和平。今乃以关系世界和平的青岛问题，置诸议和草约之外，任凭抱军国主义自命德意志第二之日本自由处置。此次和会价值，实等于零。西方德意

志虽败，东方德意志又起。”“吾中国人士，亦以酷爱和平闻于世，然欲剷除东方德意志之军国主义，亦不得不暂弃和平主义。中国政府虽麻木不仁，中国青年则可以‘背城借一’。”

同日　参加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东、西、南、北四城宣讲所组织的讲演会，发表了《青岛交涉失败的原因》的演讲。

五月十六日　成都《川报》登出了王光祈在五四夜晚写的长篇通讯，它“在成都许多人——尤其是在前进的含有革命性的知识份子圈子中，真无异是投下了一颗大的炸弹！”李劼人回忆说：“北京的‘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及时传到成都，使成都青年得以及时看到这线光明，就不能不归功于王光祈了㉖。”

五月二十日　王光祈致君左书，言及他在留意世界大势时，“不知不觉地就中了社会主义的魔术”。还说：“要研究社会主义，非研究经济学不可，故近来极欲研究经济”。并主张“将来的组织，是宜在个人自由主义之下，为一种互相的、进步的、自由的、快乐的结合。”同日，在致幼椿、太玄的信中，询问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派学说趋势，在欧洲方面就孰占优势？”“这两种以外，还有其他较善之学说否？”

以上两信以《王光祈致君左》、《王光祈致幼椿、太玄》发表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四期。

六月十三日　清华学校“仁友会”与“少年中国学会”开第一次恳亲大会，王光祈等三人代表赴会，并在会上致词。

六月十五日　“五四”运动后不久，王光祈写信，邀约李劼人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并要李在成都发展会员。李劼人入会后，在短短半个月中，又发展了九人入会。经王光祈和北京总会筹备处同意，成都分会于是日正式成立，公推李劼人为书记兼书

报管理员。

七月一日 “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上午十时，在京会员齐某回回营陈愚生宅举行正式成立大会。王光祈任大会主席。他首先报告筹备经过，接着讨论规约，选举职员，研究今后进行方法。在讨论规约时，李大钊、王光祈等六人提议，将规约第二条原文——“本学会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为宗旨，”修改为：“本学会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关于选举职员一事，由于各地会员投票，未及全额之半，到会者主张暂缓发表。在未选出职员以前，所有会务仍由筹备处主任负责办理。月刊编辑职员，亦暂由筹备处主任兼办。“少年中国学会”就这样诞生了。

“少年中国学会”筹备期间，王光祈捐献大洋一百元。从七月份起每月捐洋十元。

七月十五日 由北京总会负责编辑的《少年中国》创刊出版。编辑主任李大钊和副主任康白情，均因事未能执行职务，实际负责编辑工作的是王光祈。

同日 在《时事新报》副刊发表《致左学训》。

七月二十六日 撰写《少年中国之创造》，提出“要使中国成为未来的大同世界的一部份，使中国人民的风格、制度和学术生活等等都能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后发表于《少年中国》一卷二期。

七月中下旬 王光祈致函左舜生，讨论“小组织”的提倡问题，后以《与左舜生书》发表在《少年中国》一卷二期。文中构想在离城不远的乡间，租种一个菜园，半工半读，过世外桃源式的生活。这一讨论曾引起了一般青年的热诚关注。

七月三十一日 作《致黄霭女士书》、《致泗英（刘正江）》。

后发表于《少年中国》一卷二期。

八月一日　在《致冰先生书》和《致裴山先生》两信中，主张新生活一定要联系到妇女解放问题。

在《致夏汝诚先生书》中，王光祈说自己“是一个极穷的小子，未曾受过家庭一文的遗产，也未用过官厅一文的公费。我所有已过去的生活，都是半工半读。”他深信“这个世界是我们活动的舞台，一切不平等、不自然的束缚，我都要彻底的脱离。”信中对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十分推崇。

这一天还写了《致李贵诚先生书》、《答黄仲苏先生书》。以上函件，后均发表于《少年中国》一卷二期。

八月上旬　“少年中国学会”选举投票人数已逾会员全额之半，选举结果王光祈当选为执行部主任，负责学会对内、对外一切会务。

八月十二日　“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雷宝菁(眉生)在东京病逝，是日灵榇由日本运归北京，停放陶然亭畔，王光祈在灵旁写了悼诗《哭眉生》，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

八月二十五日　《王光祈致时珍（魏嗣銮）白华（宗之魁）书》后发表在《少年中国》一卷三期。

九月三十日　在《晨报》副刊发表《总解决与零碎解决》。文章认为，胡适和他的老师杜威，对社会问题主张零碎解决，“其流弊必使我们人类没有一个共同最高的理想、陷于一种极陕隘、极无味的事实上面。”他认为“凡人都应该有一个理想目的，都应该有一个下手的地方”。“简单说起来，就是总解决中的零碎解决”。

十月五日　复M·R先生信，发表在《少年中国》一卷四期。

《对大学开女禁问题的意见》，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四期。

十月九日　“少中”北京会员在嵩祝寺八号开会，到会有王光祈等十七人。讨论组织学术谈话会、筹办通信社、筹办义务夜校及月刊印刷编辑各事。

十月中旬　“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正式成立。该部各股职员，皆由王光祈推荐。

总务股主任王光祈兼

会计股主任孟寿椿

文牍股主任黄日葵

交际股主任徐彦之

庶务股主任邓　康

十月十二日　上午八时，“平民教育讲演团”召开第二次大会，欢送许德珩、陈宝锷赴法留学，修正简章，讨论进行方法。王光祈出席了大会。会议决定为讲演便利起见，今后分四组进行，每组设书记一人。王光祈当选为小组书记。

十月二十五日　王光祈偕吴若膺前往武汉、南京、上海、济南、天津各处接洽会务。并在上海送别李劼人等赴法留学。吴若膺（又名吴楷）是四川教育界名流吴虞之女。吴虞在“五四”时期，以猛烈攻击封建礼教出名。陈独秀称他为“蜀中名宿”，胡适说他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时，吴若膺与其妹吴辟疆（又名吴桓）均在北京协和女子大学读书。姊妹二人（人称“浣花姊妹”）慕王光祈才学，与王往来密切，吴若膺与王光祈建立了感情。

十月二十七日　晨，抵武昌。上午游黄鹤楼、抱冰堂诸名胜。下午，应恽代英之请，到武昌中华大学作了题为《动的训练》的演讲。并介绍了恽代英等三人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是夜，乘舟东下。

十月二十八日　晨，抵九江。登岸游览了甘棠湖。

十月二十九日　抵南京，赴四象桥与左舜生、黄仲苏晤面，随即前往高等师范与南京各会员讨论一切。决定《少年世界》编辑事务，由南京会员承担。黄仲苏回忆说：他“沉默端重，不苟言笑，每一论及学会旨趣，会友道义，则意兴横溢，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反复言之，唯恐未尽者㉗”。

十月三十日　抵沪，寓华盛顿里。与七年不见的李劼人、沈君怡等相见，讨论会务。

十月三十一日　与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订立《少年世界》印刷出版合同。

十一月三日　复回南京。

十一月四日　偕会员王德熙，会晤南京女界同志十余人，征求对妇女问题的意见。随后由王德熙陪同，游览鸡鸣寺、胭脂井诸名胜。下午偕同左舜生游秦淮河及雨花台诸处。夜至秦淮河复成桥赏月。左舜生为王光祈指点古迹，十分详尽，告诉他那里是朱雀桥、那里是乌衣巷、那里是旧院、市隐园、引起他诸多感想。

十一月六日　乘津浦车北上。

十一月七日　抵济南。与会员郑尚等相见。蒙山东教育界省议会新友数人招待，共游大明湖。

十一月八日　至天津，与会员章志、葛洋、陈道衡等相见。

十一月九日　返回北京。

十一月二十三日　《答A.Y.G女士》，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六期。文章主张组织女子互助社。认为：“凡是受不了家庭压迫的，均可到这个社来服务。一方面可以顾全生计问题；一方面可以在万恶社会中自为风气。既不受家庭压迫，亦不受社会压诈”。

十一月二十四日　《致太玄、幼椿、慕韩、调元》，发表在

《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六期。

十一月三十日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李超，受家庭虐待摧残，忧愤成疾而亡。蔡元培、李大钊于是日主持追悼大会，王光祈参加追悼会之后，发誓立愿要为苦寒的有志之士，寻找一条能够读书深造的道路。

十二月二日　在《晨报》副刊发表《改革旧家庭的方法》。文章认为，李超女士的追悼会，是借个题目向旧家庭、旧社会作一种示威，他提出“我们应该有一种家庭革命的实际运动，救出现在将死未死的女子。”他提议：一、组织女子周刊；二、组织女子互助社，“向旧社会开展总攻击。”

十二月四日　在《晨报》副刊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提出在城市中组织男女生活互助社，为苦学生开一个生活途径，为新社会筑一个基础。文章说：“这种团体的名称可以称为‘工读互助团’，因为在这种团体里的成员，必须具备两种资格，一作工，二读书。”“工作所得之收入，为团体公有之财产。团员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皆由团体供给。”他表示“我很愿意费些时间，专门奔走此事。”

十二月五日　应赵世炎的邀请，到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少年学会”作了题为《团体生活》的演讲，后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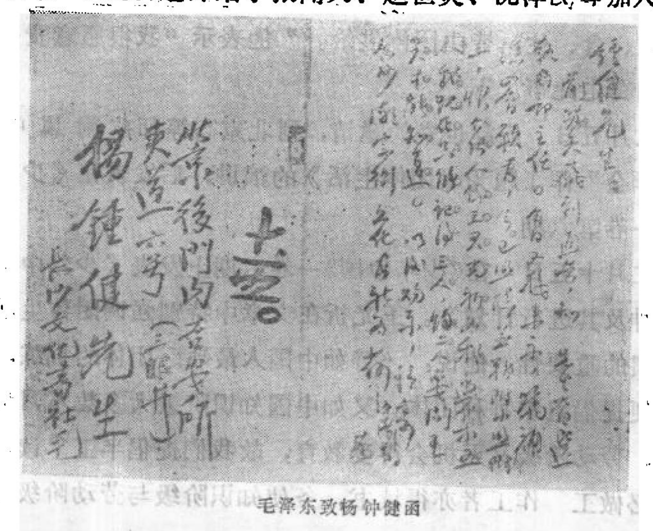
十二月十五日　在《少年中国》一卷六期上发表《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王光祈在文章中特别强调团体生活和劳动习惯的重要性。他说：“譬如中国人最缺乏团体的训练，我们学会便提倡组织种种团体。又如中国知识阶级大多数不习惯劳动生活，劳动阶级又无机会得受教育，故我们提倡半工半读，使读书者必做工，作工者亦得读书，务使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打成

一片。……”

十二月中、下旬　王光祈在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十七人的支持下，发起成立轰动全国的北京“工读互助团”。王光祈亲自草拟简章，编制预算，召开发起人会议，租房子，制家俱，接洽团员，向外募捐。不到半月工夫，“‘工读互助团’遂居然产生于‘首恶之区’的北京城里了。”

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的消息一传出，就有数百人报名参加。由于条件限制，只吸收了三十余人，成立了三个组。一面从事体力劳动，一面在各校听课。王光祈认为，只要坚持工读，不断扩大影响，将来把各地的小组织联合起来，实行“小团体大联合”，就有可能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工读互助的社会”。

十二月　湖南人民展开了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前往北京。在京期间，毛泽东和王光祈、邓中夏等常有交往。经王光祈介绍，毛泽东亦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同一时间，王光祈还介绍了张闻天、赵世炎、沈泽民等加入该会。



杨钟健先生

毛泽东致杨钟健函

一九二〇年（二十八岁）

一月四日　在成都《星期日》社会问题号第三张发表《一个社会问题》，向四川青年介绍北京的"工读互助团"。

一月五日　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七期发表《工读互助团》，认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他表示"这种组织除在北京先行着手外，将来在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各处都要设法推行。"

一月二十四日　《吴虞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载，楷女（即吴若膺）来信言："前星期我们在《少年中国》上看见王光祈的著作，我们便去会他，后来我们慢慢地商议，也就定了主意，出去工读。桓（即吴辟疆）由潘力山帮助到美国，我则同王光祈及北京大学几位先生到南京、西湖一游，再到上海，过南洋新加坡募捐及创办通讯社与演说，要提醒那边华侨。我觉得这样出去奋斗较在本国预备好得多。……我们此次出去，都由我们自己奋斗出来的，不是靠别人帮助的。"

一月二十九日　《吴虞日记》载："王光祈、王德熙、吴芳吉、孟寿椿、康白情、康纪鸿……诸人，集合同志、砥砺学行，对于四川青年，谋文化上的交通，以创造新四川，使其适应为新世界的一部份，发起《新四川》杂志社，并作其他种种的文化运动。"其社约：一不嫖，二不赌，三不娶妾。其信条：一真实，二奋斗。"

二月一日　《吴虞日记》载："楷女寄回王光祈介绍楷女入"新四川杂志社"书及"新四川杂志社"章程一份。

二月三日　《川报》刊登出新四川杂志社章程。

二月十一日　晨八时半，王光祈偕吴楷（若膺）出京，十一点半到天津，十二日午后一时到浦口渡江，乘马车至南京。

二月十三日　参观游览鸡鸣寺。《吴虞日记》载："楷来信言……到鸡鸣观游览古迹，亦无甚大味。南京城凄凉荒芜，不及北京之整洁繁华。"

二月十四日　至上海。

二月十五日　《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八期"少年中国学会消息"栏"会务纪闻"载："本会于去年七月创刊《少年中国》时，即已组织编辑部。惟当时推定编辑主任李大钊、康白情两君，均因事忙，未能执行职务，所有编辑事宜，暂由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君代理。现王光祈君将赴美留学，特于出京之前，开会讨论编辑事宜，议决组织编辑部，由李大钊、康白情、张崧年、孟寿椿、黄日葵五君任编辑事宜。"

又："本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君定于阳历二月赴美留学，并拟先行前往南洋欧洲一行，与各处会员接洽会务。王君去后，所有执行部职务由副主任陈淯君代理。"

同日　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八期发表《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文章说："去年七月一日，本会开成立大会，又蒙同人委以执行部主任之职，忽忽半年，毫无建树，清夜思之，汗如雨下。加之，一年来，无暇读书，思想破产，直欲赴郊外放声痛哭一场"。文章提出"此行先赴南洋，约住两月之久。次赴欧洲，约住一月，再次赴美洲留学。""目的有三：一、联络世界各地华侨之优秀青年。二、筹办华盛顿通讯社。三、个人求学问题。"

文章表示："我此次出国，亦是最末一次之洪炉，若是仍毫无所得，最好是到太平洋里与鱼虾作伴侣，永远不要再与诸兄见面了。"

二月二十七日　全国各界联合会在上海召开，到会者有陈独秀、王光祈、汪孟邹、左舜生、康白情、陈宝锷、张国焘、刘清扬、宗白华、涂开舆、戴季陶、沈玄庐、彭璜、肖子章等二十余人。会议报告了北京、天津等地"工读互助团"的进展情况；着重讨论了有关"工读互助团"的宗旨和办法；并筹备在复旦、南洋等校附近建立"上海工读互助团"。陈独秀、王光祈都在会上作了发言。"上海工读互助团"列名发起人计有陈独秀、王光祈、毛泽东、彭璜、肖子璋等二十六人。

二月下旬　毛泽东在北京曾参观了"女子工读互助团"，他在给陶毅的信中说："今日到'女子工读互助团'……觉得很有趣味！"㉘

三月十四日　毛泽东在北京给周士钊的信中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种组织，也可叫做'工读互助团'"㉙。

三月三十日　《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十一期"会员通信"栏载："润玙、时珍、剑翛临走前一晚，上海同人对于两种月刊改革事，曾有所聚议。拟《少年中国》从二卷一号起，《少年世界》从一卷八号起，彻底刷新，即每间一期出一特别号，按照两种月刊性质，分国研究。《少年中国》七月十五、《少年世界》八月一日，同时出日本号，间一期出法国号、俄国号以次例推。法国号、德国号由王光祈负责组稿。

黄仲苏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君复举介绍会友，召集年会，

推行月刊诸事，相与讨论，且谈且录入手册。神情欣悦，而语多亲切，顾虑周详，指挥若定。”“会将散，君慨然叹曰：‘国事败坏，岂真不可收拾耶！吾人律己必严，努力向学，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十年二十年后，当可有为。今日之事，拨乱而反诸正，固非异人任也。果欲报国，岂乏机缘，但恐力之不胜耳！’又曰：‘求学宜专，办事尚忠，为人贵诚，……志存救国，言行相顾，而不谓俗尚所左右者，乃得谓新少年’”㉚。

三月三十一日 陈独秀、汪孟邹等为王光祈饯行。

四月一日 王光祈以北京《晨报》、上海《申报》、《时事新报》特约通讯记者身份，与“少年中国学会”会友魏嗣銮、陈宝锷同行赴欧留学。会友涂开舆前往新加坡从事教育。共乘法船“保来加”号，由上海启航。王光祈由于经济拮据，赴德旅费由魏嗣銮慨然资助。

同日 在《新青年》第七卷五期发表《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文章认为，“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人的问题”。表示他“对于此种组织，仍是十分信仰，仍有十分希望。”

四月三日 船过香港，王光祈作《去国辞》五章，辞中说：“欲洗污浊之乾坤，只有满腔之热血”，“愿我青春之中华，永无老大之一日”，“惟我少年努力努力！”此词湖南姜君曾为之谱曲。

四月四日 在香港写成《欧游通信》（一），发表在五月四日《申报》副刊《自由谈》上。

四月八日 船抵越南北部海防市，王光祈与魏嗣銮诸友上岸游览，途中颇多感慨，魏时珍在给梦九、白华、君怡的信中说：“其最大者有二：一、海防居民大半贫瘠，体躯干瘦如柴，沿街

行竟晨，竟无一身着完全者。”“为人奴隶，无一自由，纵不能死于锋刃，亦将死于贫瘠，诚可慨也”。“二、海防与西贡居民惧外人甚至，见欧人与之言，辄战慄不能成声。尝见一法兵汲水，有安南（即今越南）人在前，法兵令其去，偶行稍迟，辄以杖击其胫。……而安南人乃甘心受之。”“以如此之民气，而欲望其重兴，岂可得也。”该信后发表于《少年中国》二卷二期。

四月十三日　在西贡写成《欧游通信》（二），文中提及“安南地居热带，物产丰富，然其人奇穷异常，虽终岁劳动所得，仍不足糊口。当记者舟离海防时，舟中获贼二十五人，类皆饥饿难堪，故匿舟中，以窃食物，冀得一饱。……敬告国人，勿以吾国物产丰富为可恃也。”

四月十五日　船过南洋，王光祈与魏嗣銮、陈宝锷讨论“动机”与“效果”问题，争论十分热烈。经魏嗣銮整理成文，以《当如何批判——南洋舟中一席谈》为题，发表在《少年中国》二卷一期。

同日　在新加坡写成《欧游通信》（三）（四），载《申报》五月十九日、二十日“自由谈”。

四月二十一日　在锡兰岛之哥仑布写成《欧游通信》（五），载六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四月二十三日　王光祈在印度洋致学会诸同志的信中说：“弟因在沪时，检查身体，以有眼疾，非医好后，不能赴美。弟遂临时改道赴德。”“此次经过安南之海防、西贡及英属新加坡、哥伦布各处，受刺激极深。见彼白人之经营东亚，不遗余力，而吾有色人种，在彼等支配管理之下，苟延残喘。不知自拔，令人悲从中来，不能自已。”信中提出组织国内旅行团和国外旅行团，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实地考查。组织博物馆、实验室、植物园

等，以为学术上之切磋。此信后发于《少年中国》二卷一期。

四月二十六日　魏嗣銮自吉布提寄梦九、白华、舜生，君怡的信中说："海上情形，恶足言哉，四等舱污秽霉烂，仰则烟雾涨天，俯则弃屑狼籍，人居其中。如在釜中，心胃沸热，首昏欲坠，终日之间，痛苦而已。""至于国弱人微，受人欺侮，其屈曲可怜之状，实在不忍言。为弱国民，乘四等舱，履他邦土，触处皆令人深愤耳，有何可言者耶！""吾与光祈、宝锷身体尚好，夜则共聚谈论，大抵为'批判问题'。其次为'演说问题'。又其次为'男女社交态度问题'。"此信后发表于《少年中国》第二卷二期。

五月二日　在非洲北岸之波赛写成《欧游通信》（六），发表在六月十八日《申报·自由谈》。

五月四日　船行至红海，同舟居励今君发起集会，纪念"五四"运动。陈剑翛回忆说：居励今"以我们和林长民氏曾身历其境，约作演说。林氏不自量的大吹擂一场，被若愚破口驳得体无完肤。我则自认'五四'之后，应埋头向学术研究努力，也被若愚责备何其抱负之小了。"他在船上常常自负自豪地讲："少年崛起，中国复兴，倘果得为国家尽瘁，那么丰功伟烈，正属大丈夫分内之事。"

五月六日　船抵马赛。

五月七日　到达巴黎。李璜回忆说："是时，我同劼人、鲁之、太玄寓于巴黎近郊一破落户旧日放马车之室中。在车站迎候光祈、时珍来。入室，光祈笑呼：'拿肉来吃'"！"四等舱三十六日，所食系头、二等厨中弃而不用之肉屑，且不能多。故时珍非吃清炖肥牛肉不可。我买甚肥之牛肉不能得，乞得屠户将卖作化学工业用之牛油一小团，交劼人、太玄如其法炖之，碗上油厚

几及二寸。光祈一面食油，一面笑谈，喉愈润而声愈高。屈指会友赴欧美留学者已三十余人，某友习何科，将来可创造某事业，觉中国事大有可为也！谈三日，别去。彼此觉生平朋友之乐，未有乐于此时者。”

六月一日　抵德国法兰克福。他在致幼椿、太玄、劼人、鲁之的信中说：“弟因初到德国，所租之房尚未搬住（因尚有人住着），须七、八号始能搬去，此时尚寄居德烈士博士之家。”“弟与时珍及郑寿麟、吴屏诸兄各租一屋，皆系近邻。时珍等皆在弟之房东处包饭。”弟所居在法兰克福郊外……开窗临野，可望数里之遥，皆系绿野平芜，全系故乡风味。……弟已决定在此专心学德文，数月中绝不履城市。”此信后发表在《少年中国》二卷二期。

六月四日　在致慕韩、少襄、哲生的信中说：“弟于一日抵德国之法兰克福……现已着手补习德文，决定数月中不履城市，每日除读书外，尚可与德烈士博士谈聚欧洲现势及学术近况，受益不少。”此信后发表在《少年中国》二卷二期。此后，每晚由魏时珍口译德文报刊，王光祈笔记整理成文，寄回国内有关报刊发表，以通信稿费维持生活。

六月五日　在周太玄兼办的《旅欧周刊》第三十号上发表《工读互助与勤工俭学》。

六月十二日　在法兰克福写成《德意志各党之内容》，载《申报》八月十三日、十四日。

六月十七日　写成《选举后之德国政局》，载《申报》八月十五日、十七日。

七月十九日　写成《最近德国之经济状况》，载《申报》九月十五日、十六日。

七月二十三日　在欧会员为了讨论会员学行砥砺问题、整顿会务问题、月刊稿子问题、法国会员曾琦等公推周太玄来德商议一切。

七月二十四日　周太玄偕宗白华来德，会同王光祈、魏时珍在法兰克福附近山林会商连日。

七月三十日　周太玄、魏时珍、宗白华、王光祈将会商的结果，函致国内同志。后发表在《少年中国》二卷四期。



王光祈（左二）、宗白华、魏嗣銮在野外会商“少年中国学会”有关问题

八月十八日　写成《俄波问题与国际形势》，载上海《时事新报》，十月二十日。

八月二十七日　写成《德国大学的危机》，载上海《时事新报》，十月二十一日。

八月二十八日　在《旅欧周刊》第四十二号发表《旅欧同人的使命》。

九月十二日　写成《德国科学界的大论战》，载上海《时事新报》，十一月五日。

九月十三日　写成《美德结约与英美争霸》，载上海《申报》，十一月九日。

九月十七日　写成《社会民主党又欲上台》，载上海《时事新报》，十一月十日。

九月二十一日　写成《德国一年来金融状况》，载上海《申报》，十一月十日。

九月二十五日　写成《法国新总统对德政策》，载上海《时事新报》，十一月十一日。

九月二十九日　写成《德意志破裂之危机与世界前途之关系》，载上海《申报》，十一月十二日。

十月十三日　写成《比京国际财政会讨论情形》，载上海《时事新报》，十二月八日。

十月十八日　写成《留德学界之近况》，载上海《申报》，十二月十日。

十月二十日　写成《独立社会民主党之分裂》，载上海《时事新报》，十二月十日、十一日。

十月二十五日　写成《德国各党之党纲及其现状》，载上海《申报》，十二月十七日，十八日。

十月二十六日　写成《德意志共产党演说大会记》，载上海《时事新报》，十二月三十日。

十月二十八日　写成《俄波和议后之俄国》，载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

本月　在《旅欧周刊》第四十七号发表《分工与互助》。

十一月十五日　在《少年中国》二卷五期发表《旅欧杂感》。

十二月一日　写成《一年来俄国之形势与各国对俄关系》，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十二月五日　写成《最近德国私运资本出境之大公案》，载

上海《申报》，一九二一年二月三日。

十二月十日　致恽代英书。认为“工读互助团”失败，完全是人的问题（此信后发表于《少年中国》二卷十一期）。

十二月十五日　《少年中国》二卷六期“少年中国学会消息栏”“本会通告”载：“会员诸兄：太玄等从德国寄回的信，登在《少年中国》二卷四号……。北京同人对于他们所拟制的一个表，极表同情，都说：‘我们同志都可以填写，于本人于学会两有利益。’”这个表是周太玄、王光祈等本年七月拟制的。格式及王光祈填写的内容如下：

姓名	终身欲研究之学术	终身欲从事之事业	事业之着手时日及地点	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	最近住址	备考
王光祈	经济学	新村及工读互助团	民国十五年北京及其近郊	手工艺及教育		

十二月　在巴黎《旅欧周刊》发表《留学界两大潮流》。

一九二一年（二十九岁）

一月十一日　写成《德国对华之外交〔1〕关于派遣使节的意见》，载上海《申报》，三月二日。

一月十五日　在《少年中国》二卷七期发表《分工与互助——旅欧杂感之一》。本文写于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九日，曾发表于《旅欧周刊》。

一月二十日　写成《德国对华之外交〔2〕德国在华之学校政策》，载上海《申报》，三月十五日。

一月二十六日　写成《德国对华之外交〔3〕德国对华之新闻事业》，载上海《申报》，三月三十一日。

一月三十一日　写成《德国对华之商业甲、德国所需之华

产》，载上海《申报》，四月三日、四日、五日。

二月四日　写成《德国对华之商业乙、德国对华之输出》，载上海《申报》，四月七日、八日。

二月九日　由中国留德学生中纨绔子弟操纵的柏林“中国留德学生会”，认为王光祈在《申报》发表的《留德学界之近况》，“内容不真，有伤此间学生之名誉”，委托德律师博罗向法庭起诉。本日博罗致函王光祈说：“君曾谓此间生活，每月五百马克已可足用。又谓此间学生常常寝至中午，午后赌博，晚则与妇女游行……如此类者，殆难备举。因此种情形之颠倒，于是留学者之父母，脑筋顿起不安。”博罗律师要求王光祈立刻更正。除在上海更正外，还须向“中国留德学生会”及外交代表道歉。博罗威胁说：“如果十日之内，犹无承认之答复，我即向法庭起诉。”信中还要求王光祈付给他因此事而需之费用㉛。

二月十一日　王光祈复函博罗，略谓：“君来信所指之人，系上海《申报》之特约通信员，彼祇对该报负责，……故有人对其通信欲提出抗议者，请自与该报交涉。通信员自身无此责任。”“至于君因此事所费之款，亦请自向委任者索取。”

二月十二日　致书柏林“中国留德学生会”，对该会援引“洋大人”对他进行诈吓，进行了愤怒的斥责。他说：“若诸君能以中国法律与王光祈相见，王光祈尚可与之周旋，若引‘洋大人’以自重，则非王光祈所能从事矣”。“王光祈系顶天立地之男子，……宁肯受屈以至于死，亦不愿依赖‘洋大人’之力，以与同族争此丑事也”，“诸君驰书骂我，我必不怒，诸君持刀杀我，我必不怨，惟引‘洋大人’以自重，则吾泪涔涔下矣！曾不料吾中华民族之堕落，竟至于如此。”据魏时珍回忆：柏林中国留德学生会得到王光祈的回复，大哗，开会集议，举无善计。适蔡元培

先生自法来德，“中国留德学生会”举行欢迎大会，并将王光祈之事，告诉蔡元培，希望得到蔡的支持。蔡元培在北京时很了解王光祈，不但未与支持，且为王辩护。“留德学生会”一些纨绔子弟，极为不满，有人甚至极不礼貌。蔡元培在会未开完时即拂袖而去[22]。

二月十五日　在《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八期发表《旅欧杂感》。文中指出：德国有一本书，名叫《桃花》，所载均系中国诗歌，有许多译自《诗经》。德国一家报纸有一天转载了几首，评价说：“试想数千年以前，我们德国是何等野蛮状态，而中国已有如此美丽的诗歌，若拿德国文艺与中国文艺比较，德国只算一个乞丐。”文章希望将中国文化尽量输入欧洲，向西方介绍东方文明。

同日　与魏嗣銮、宗白华等发起组织留德学生“中德文化研究会”，其宗旨是：促进中德文化交流；促进中德两国民族的了解和同情。

二月十六日　写成《德国对华之商业丙、对华商业之计划》，载上海《申报》，四月十六日、十七日。

二月十九日　写成《伦敦会议与德国》，载上海《申报》，四月二十六日。

二月二十三日　写成《普鲁士邦会选举时之情形》，载上海《申报》，四月三十日。

三月十二日　致恽代英书，提出反对国家主义、主张民族主义。他说：“我们说的民族主义当然不是拿我们的民族去侵略他人的民族，只是主张我们这个又勤又俭的民族，素有文化的民族，要在世界上谋一个安全的地位。我们若对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类，都不设法拯救，那便是我们对不住世界，对不住人类。”“我在国外受刺激太多了，外国人无论新旧，早把‘劣等民族’

四字头衔送给我们了。但是我又相信，我们勤俭智慧的民族，很有改造世界的能力。”此信后发表于《少年中国》二卷十一期。

三月二十一日　写成《关于研究中德文化之两团体》，载上海《申报》，五月四日、五日。

三月二十八日　写成《世界经济重心之转移》，载上海《申报》，五月二十三日。

三月三十一日　写成《外国资本压迫之中欧》，载上海《申报》，五月二十四日。

四月十五日　写成《德意志之青年同盟》，载上海《申报》，六月十一日、十二日。

四月二十五日　写成《德国人之研究东方文化热》，载上海《申报》，六月十四日、十六日。

四月　写出了《对今年七月南京大会的提议》，其基本精神是：“学会不标某种主义之笼统名称，而对于将来之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及其进行步骤、运动方法，皆加以具体之描写。如果此种具体描写之组织及方法已为同人所赞成，将来即以此种组织及方法作为本会对于某项事业进行之方针，换言之，即本会主义。”此提议后发表于《少年中国》三卷二期。

五月十九日　写成《德国新政府组织之经过》，载上海《申报》，七月十四日。

五月二十七日　写成《最近欧洲国际间之风波》，载上海《申报》，七月十八日。

六月三日　写成《中德和约签字后之德国》，载上海《申报》，七月二十五日。

六月八日　午夜三时与魏时珍至达尔模城，聆听泰戈尔讲《东西问题》。

六月二十五日　写成《履行最后通牒与左右两派》，载上海《申报》，八月八日。

七月一日　写成《德国最近之财政》，载上海《申报》，八月十五日。

七月八日　写成《马克之过去与将来》，载上海《申报》，八月二十二日。

七月二十三日　写成《奥国之新内阁及各党派》，载上海《申报》，九月八日。

七月二十八日　写成《最近德国之银行界》，载上海《申报》，九月十六日。

七月三十日　写成《多数社会民主党党纲之更改》，载上海《申报》，九月十八日。

七月　参加了德意志国民党在一个森林里举行的报告会和游艺晚会。王光祈回忆说："我那天自朝至暮，在会场中踱来踱去，……觉得欧洲人自少至老，无不心有所托，情有所泄，""只知向前进取，不知烦闷悲观。"[13]

九月二十二日　写成《我所知道的安斯坦》，发表于《少年中国》三卷七期。

九月二十八日　写成《德国四党内阁之运动》，载上海《申报》，十一月十日。

本月　在德国《文化报》发表用德文写成的《论中国海外留学生在中国政治发展上的影响》。在德国《法兰克福日报》发表用德文写成的《德国在中国的文化政策》。

十月五日　写成《德国在华外交官制之更改及使领人员之派遣》，载上海《申报》，十一月五日。

十月十五日　写成《德国赔偿问题与英意两国经济》，载上

海《申报》，十一月二十九日。

十月二十七日　写成《德国学者与世界哲学大会》，载上海《申报》，十二月四日。

十月二十九日　写成《德国上西莱亚问题失败之由来》，载上海《申报》，十二月十七日。

十月　自德国寄回《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一文，提出："'少年中国学会'者，系表现由政治改革进而为社会改革之精神者也。""'学会'即以社会改革为号召，故其所从事者为社会事业，社会事业者何？教育与实业是也。教育所以谋国人精神上之解放，实业所以谋国人物质上之解放。"本文后发表于《少年中国》三卷八期。

十一月五日　写成《战后全欧各国之金融》（一），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二年一月三日。

十一月二十二日　写成《战后全欧各国之金融》（二），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二年一月六日。

十一月二十九日　写成《战后全欧各国之金融》（三），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二年一月十日。

十二月十五日　写成《最近马克暴涨暴跌之原因》，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二年二月一日。

十二月十七日　写成《德国之纸币》，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二年二月七日。

十二月二十四日　写成《德国赔款问题与英法对德态度》，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写成《一九二一年之德国》，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

一九二二年（三十岁）

一月十四日　写成《开恩斯会议之前因后果》（一），载上海《申报》，二月二十五日。

一月十五日　写成《开恩斯会议之前因后果》（二），载上海《申报》，二月二十六日。

一月二十一日　写成《开恩斯会议之前因后果》（三），载上海《申报》，三月六日。

一月二十八日　写成《德国新税问题之解决》，载上海《申报》，三月二十四日。

二月四日　写成《开恩斯会议之前因后果》（四），载上海《申报》三月二十八日。

二月十二日　写成《铁路罢工与官吏生活》，载上海《申报》，三月二十六日。

二月二十一日　写成《俄法外交关系变迁之传闻》，载上海《申报》，四月六日。

二月二十五日　在法兰克福写成《中国人之生活颠倒》，发表于上海《学生杂志》九卷七号。

本月　在加拿大华人工会刊物发表《读了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学说后的感想》，提出："现在我们最大的责任，便是农村改造，便是创造一种基于农业的社会主义。""傅立叶的社会主义是建筑在农村上面的，""生长于农业之国的中华民族，读了傅立叶的学说，更觉加倍有趣。"

三月一日　在《少年中国》三卷八期发表《社会的政治改革与社会的社会改革》。文中推崇托尔斯泰说："若托尔斯泰者，则吾只有歌之咏之以表其崇拜信仰热忱，奉为吾党社会活动唯一

无二之良师也。”

同日　写成《各国对俄态度之变迁与俄国对付各国之策略》，载上海《申报》，四月十七日。

三月十五日　写成《最近马克跌价之三大原因》、《德国强迫公债之摊购办法》，载上海《申报》，四月五日。

三月二十二日　写成《德国对外输出之发展》，载上海《申报》，五月三日。

三月二十八日　写成《德国赔款问题之新决定》，载上海《申报》，五月六日。

三月三十一日　写成《德国报界之厄运》，载上海《申报》，五月十二日。

四月一日　在《少年中国》三卷九期发表《傅立叶的理想组织》。

四月十日　热那亚国际经济会议在意大利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三十四国的代表，还有近七百名各国新闻记者，这是欧洲各国代表举行的一次最大的欧洲会议。王光祈及时地向国内作了报道。本日，写成了《日诺瓦（热那亚）会议开幕前之所闻》，载上海《申报》，五月二十日。

四月十九日　写成《日诺瓦会议时之意外风波》（一），载上海《申报》，六月二日。

四月二十五日　写成《日诺瓦会议时之意外风波》（二），载上海《申报》，六月十二日。

四月二十九日　写成《日诺瓦会议之讨论形式及其会外文章》，载上海《申报》，六月十四日。

五月二日　写成《日诺瓦会议中之俄国问题》（一），载上海《申报》，六月十五日。

五月三日　写成《日诺瓦会议中之俄国问题》（二），载上海《申报》，六月十六日。

五月四日　写成《日诺瓦会议中之俄国问题》（三），载上海《申报》，六月十九日。

五月九日　写成《日诺瓦会议中之俄国问题》（四），载上海《申报》，六月二十六日。

五月十一日　写成《日诺瓦会议中之俄国问题》（五），载上海《申报》，六月二十七日。

五月十四日　写成《日诺瓦会议中之俄国问题》（六），载上海《申报》，六月二十八日。

五月十九日　写成《日诺瓦会议中之海牙会议问题》，载上海《申报》，七月一日。

五月二十日　写成《日诺瓦会议之回顾》（一），载上海《申报》，七月七日。

五月二十二日　写成《日诺瓦会议之回顾》（二），载上海《申报》，七月九日。

六月六日　写成《德国之新闻事业》（一），载上海《申报》，七月二十三日。

六月七日　写成《德国之新闻事业》（二），载上海《申报》，七月二十四日。

六月十三日　写成《德国之新闻事业》（三），载上海《申报》，七月二十五日。

六月十四日　写成《德国之新闻事业》（四），载上海《申报》，七月二十六日。

六月二十日　写成《上西莱亚之实行分割》，载上海《申报》，八月十一日。

六月二十六日　写成《德国之恐怖时代》（一），载上海《申报》，八月十二日。

六月二十七日　写成《德国之恐怖时代》（二），载上海《申报》，八月十三日。

七月一日　写成《德国之恐怖时代》（三），载上海《申报》，八月十四日。

七月五日　写成《德国之恐怖时代》（四），载上海《申报》，八月十八日。

七月二十三日　写成《德意志之中等教育》（一），载上海《申报》，九月六日。

七月二十四日　写成《德意志之中等教育》（二），载上海《申报》，九月八日。

七月二十五日　写成《德意志之中等教育》（三），载上海《申报》，九月九日。

七月二十六日　续写《德意志之中等教育》（四），载上海《申报》，九月十日。

七月二十七日　续写《德意志之中等教育》（五），载上海《申报》，九月十一日。

七月二十八日　续写《德意志之中等教育》（六），载上海《申报》，九月十二日。

七月二十九日　续写《德意志之中等教育》（七），载上海《申报》，九月十三日。

七月三十日　写成《德国最近之生活》（一），载上海《申报》，九月十六日。

本月　由法兰克福迁居柏林马利杜夫街十六号。

八月一日　写成《我们的工作》，发表于《少年中国》四卷

一期。

同日　写成《德国最近之生活》（二），载上海《申报》，九月十七日。

八月九日　写成《德国之离婚问题》，载上海《申报》，九月十八日。

八月十日　"国际青年团"在葛廷根召开第四次年会，王光祈应邀列席。该团首领为葛廷根大学哲学教授纳尔逊博士。该教授崇拜中国孔子，每次开会均先读《论语》。会上，王光祈以"少年中国学会"驻德代表，散发了一张传单，提出我们的特殊工作，一是中国农民阶级改造运动；二是亚洲弱小民族自决运动。

八月十八日　写成《国际青年团》（一），载上海《申报》，十月一日。

八月十九日　写成《国际青年团》（二）、（三），载上海《申报》，十月二日、四日。

八月二十五日　写成《来德留学者注意》，载上海《申报》，十月五日。

八月二十六日，　写成《葛廷根大学之特色》，载上海《申报》，十月六日。

八月二十七日　写成《留德学界之组织》，载上海《申报》，十月十一日。

八月二十八日　写成《中国美术展览会》，载上海《申报》，十月十六日。

八月三十日　写成《柏林人之道德问题》，载上海《申报》，十月十七日。

八月三十一日　写成《柏林之房荒问题》，载上海《申报》，

十月十八日。

九月五日　写成《最近柏林市上之恐慌现象》，载上海《申报》，十月十九日。

九月七日　写成《德国报界前途之危机》，载上海《申报》，十月二十日。

九月十日　写成《最近德国之粮食恐慌问题》，载上海《申报》，十月三十日。

九月十二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一）荷兰》。载上海《申报》，十一月一日。

九月十四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二）波兰》。载上海《申报》，十一月二日。

九月十八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三）里特伦》。载上海《申报》，十一月三日。

九月二十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四）爱斯提兰》。载上海《申报》，十一月十二日。

九月二十二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五）捷克斯拉夫》。载上海《申报》，十一月十三日。

九月二十四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六）希腊》。载上海《申报》，十一月十五日。

九月二十七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七）丹麦》。载上海《申报》，十一月十七日。

九月二十九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八）瑞典》。载上海《申报》，十一月十八日。

十月二日　致书左舜生，发表在《少年中国》四卷二期。

十月四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南斯拉夫》。载上海《申报》，十一月二十七日。

十月五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一）瑞士》。载上海《申报》，十二月三日。

十月九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二）西班牙》。载上海《申报》，十二月七日。

十月十一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十三）罗马尼亚》。载上海《申报》，十二月十一日。

十月十二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四）奥大利》。载上海《申报》，十二月十六日。

十月十四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十五）意大利》。载上海《申报》，十二月十九日。

十月十八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十六）俄罗斯》。载上海《申报》，十二月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七、二十九日。

十月三十一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十七）唐车》。唐车是波罗的海的自由都市，为波兰出海的主要通道。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

十一月四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十八）比利时》。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一月六日。

十一月十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十九）法兰西，甲、财政问题》。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

十一月十一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十九）法兰西，乙、商业情况》。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四日。

十一月十二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十九）法兰西，丙、农工状况》。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

十一月十五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二十）立陶宛》。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九日。

十一月十七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二十一）芬

兰》。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十一月二十日。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二十二）土尔其》。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二十三）挪威》。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十一月二十五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二十四）德意志，甲、商业情况》。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

十一月二十八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二十四）德意志，乙、农业状况》。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二月六日。

十一月二十九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二十四）德意志，丙、工业情况》。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二月八日。

十二月一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二十四）德意志，丁、财政问题》。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二月十日。

十二月九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二十五）英吉利，甲、金融现象》。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十二月十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二十五）英吉利，乙、商业情形》。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十二月十二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二十五）英吉利，丙、工业状况》。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十二月十五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二十六）勃加利》。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三月二日。

十二月十六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二十七）卢森堡》。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四日。

十二月二十五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二十八）乌克

兰》。《（二十九）葡萄牙》。《（三十）亚尔巴尼亚》。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十二月二十六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三十一）全欧各国财政状况》。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四月三日。后转载于《少年中国》四卷三期。

十二月二十七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三十二）全欧债务概观》。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四月九日。后转载于《少年中国》四卷三期。

十二月二十八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三十三）全欧金融概观》。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四日。后转载于《少年中国》四卷三期。

十二月二十九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三十四）全欧商业概观》。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后转载于《少年中国》四卷三期。

十二月三十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三十五）全欧农业概观》。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四月三十日。后转载于《少年中国》四卷四期。

十二月三十一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三十六）全欧工业概观》。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二日、十三日。后转载于《少年中国》四卷四期。

冬　在柏林随一德国私人音乐教师学习小提琴和音乐理论。"放弃研究经济之愿，改习音乐历史"[31]。

一九二三年（三十一岁）

一月六日　在柏林致函"少年中国学会"同志，略谓："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之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之推翻，固为吾辈素

志，惟欲实现此种目的，非先造成社会势力不可（换言之以社会事业作基础之势力）。弟相信只有此种社会势力，始能抵抗帝国主义，推翻军阀巢穴”。后发表在《少年中国》四卷二期。

二月十二日　写成《德意志之青年运动（一）青年运动之派别》。载上海《申报》，五月二十四日。

二月十三日　写成《德意志之青年运动（二）国家主义之青年运动》。载上海《申报》，六月二日。

二月十四日　写成《德意志之青年运动（三）无产阶级之青年运动（上）》。载上海《申报》，六月四日。

二月十五日　写成《德意志之青年运动（四）无产阶级之青年运动（中）》。载上海《申报》六月八日。

二月二十三日　写成《德意志之青年运动（五）无产阶级之青年运动（下）》。载上海《申报》，六月十五日。

二月二十四日　写成《德意志之青年运动（六）民主主义之青年运动》。载上海《申报》，六月十九日。

二月二十六日　写成《德意志之青年运动（七）各种宗教之青年运动》。载上海《申报》，六月二十日。《（八）自由青年之青年运动（上）》，载上海《申报》，六月二十六日。

二月二十七日　写成《德意志之青年运动（九）（十）“自由青年之青年运动”（中）、（下）》。载上海《申报》，七月三日、五日、六日。

《少年中国》四卷五期全文转载了《德意志之青年运动》，并附说明如下：

“王君此文曾分载于五月二十四日及七月六日的《申报》，间转登载，不便检阅，特转录本刊”。

三月四日　德国来比锡举行春季赛会。柏林外交部邀约各国

驻德新闻记者前往参观。王光祈应邀于午后四时由柏林乘赛会专车去该城。同行者有日本、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十三国记者。

三月二十二日　写成《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一）》载上海《申报》，七月十三日，十四日。

三月二十三日　写成《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二）》，载上海《申报》，七月十七日。

三月二十五日　写成《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三）来比锡赛会之性质及其内容》。载上海《申报》，七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三月二十六日　写成《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四）来比锡赛会中之外国陈列》。载上海《申报》，七月二十四日。《（五）来比锡赛会中之德国陈列。》载上海《申报》，七月二十五日。

三月二十九日　写成《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六）德意志工厂股份公司》。载上海《申报》，七月二十六日。

三月三十日　写成《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七）克虏伯厂》。载上海《申报》，七月二十七日。

三月三十一日　写成《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八）德兰斯登之工业学校》。载上海《申报》，七月二十八日。

四月二日　写成《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九）德兰斯登之美术设备》。载上海《申报》，七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日　写成《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十）自由战争之历史纪念》。载上海《申报》，八月十四日。

四月十六日　写成《战后世界商业之趋势（一）美国》。载

上海《申报》，八月十六、十八日。

四月十七日　写成《战后世界商业之趋势（二）英国》。载上海《申报》，八月二十一日。

四月十八日　写成《战后世界商业之趋势（三）法国、德国》。载上海《申报》，八月二十四日。

四月二十二日　写成《世界航务之现状（一）汽车帆船之消长》。载上海《申报》，九月九日、十月四日。

五月二十九日　在柏林写成《我们应该怎样运动》。文章认为"要着手中国农民阶级改造运动，第一必须先握乡村教育权柄。""要从事亚洲弱小民族自决运动，第一必须先谋民族交际机会。"为此，他建议：一、组织乡村教育协会；二、成立亚洲民族交谊会。后发表于《少年中国》四卷五期。

九月九日　写成《德国人的音乐生活（一）德国音乐与中国》。载上海《申报》，十月七日。

九月十日　写成《德国人之音乐生活（二）德国音乐之来源》。载上海《申报》，十月八日。

九月十一日　写成《德国人之音乐生活(三)德国音乐之始祖》。载上海《申报》，十月十二日。

九月十六日　写成《德国人之音乐生活(四)德国乐中之三杰》。载上海《申报》，十月十五日。

九月十七日　写成《德国人之音乐生活(五)三杰以后之音乐》。载上海《申报》，十月十六日。

九月十八日　写成《德国人之音乐生活（六）十九世纪之名家》。载上海《申报》，十月二十日。

十一月一日　在上海《申报》发表《世界农产之近况(一)各洲麦额之增减》。

十一月四日　在上海《申报》发表《世界农产之近况(二)各国农产之调剂》。

十一月九日　在上海《申报》发表《世界人口问题(一)战前战后之比较》。

十一月十三日　在上海《申报》发表《世界人口问题(二)人口密度与移民趋势》。

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上海《申报》发表《德国人之音乐生活（七）德国乐中之歌剧》。

本月　在柏林南郊阿笃夫街住宅完成《欧洲音乐进化论》一书，并作序。该书一九二四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十二月五日　在上海《申报》发表《德国人之音乐生活（七）德国乐中之歌剧（续）》。

十二月六日　在上海《申报》发表《德国人之音乐生活(八)德国乐中之趣剧》。

十二月十日　在上海《申报》发表《德国人之音乐生活(八)德国乐中之趣剧（续）》。

十二月十七日　在上海《申报》发表《德国人之生活（九）德国乐中之艺师》。

十二月二十一日　在上海《申报》发表《德国人之音乐生活（十）音乐中之民族主义》。

十二月　在柏林为《德国人之婚姻问题》撰写了序言。该书原稿系本年二月为《申报》作。后因此稿内容不合该报要求，未曾刊登。十月份中华书局向报社索回原稿，列入《少年学会小丛书》，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出版。

一九二四年（三十二岁）

一月十九日　在柏林完成《西洋音乐与诗歌》一书。该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叙述西洋音乐与诗歌的关系；中编介绍西洋诗歌音乐十二名家的生平及其作品；下编对诗歌乐谱进行解析。在序言中他主张“介绍西洋诗歌乐谱，应该同时介绍谱中原诗”，“因为乐谱的内容是与他的诗歌的意义相应的。”他针对有人借用西洋曲谱填词，认为这是“牛头不对马嘴”。

二月　在《少年中国》四卷十期发表《社会活动之真义》。主张“办学校、报馆、实验室、博物院等”，推行“有基础事业的文化运动”。

三月十九日　写《致苏州会议诸同志》。对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四日苏州会议宣言中“徘徊歧路，未敢自决其行动方针”一句，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学会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本会持此宗旨与国人相周旋者业已数年。即弟等个人求学作事，亦以学会之宗旨为宗旨”。“凡人一日未能自决其行动方针，则一日不能生活下去。弟自信本会行动方针，早已决定。所惜者，行动太少，是为愧耳。”该函后发表于《少年中国》第四卷第十二期。

三月三十日　在柏林将自己几年来撰写的关于“少年中国学会运动”的重要文章，编为一集，名为《少年中国运动》。共计：论文八篇，通信三篇，附录一篇。并写了《少年中国运动序言》。后作为《少年中国学会小丛书》，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五月二十五日　在柏林完成《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一书。他希望这本书能使中国教育界的西洋音乐知识稍稍普及，更由此引起国人研究音乐的雄心，以创造代表中华民族的国乐。该书一

九二五年七月由中华书局刊行。

七月四日　在柏林完成《西洋音乐与戏剧》一书。一九二五年二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九月一日　在柏林完成《西洋乐器提要》一书。本书分三编，上编介绍了西洋乐器的类别及其历史，中编详列各种西洋乐器的形式，下编详述西洋乐器的应用。他希望本书出版能引起国内研究音乐同志的兴趣，也有一本研究中国各种乐器原理及作用的书籍出现。一九二八年一月中华书局出版。

十二月十六日　在柏林完成《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本书对东西乐制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东方以中国为主，旁及印度、阿拉伯、波斯。西方以欧洲近代为主，远溯希腊及中古的教堂乐制。他在自序中说：“所谓乐制者，即研究‘律’与‘调’两大问题之义也，研究乐制而兼及东西各国者，欲以便于比较也”。该书一九二六年一月由中华书局刊行。

一九二五年（三十三岁）

三月十九日　在柏林完成《西洋制谱学提要》。他在序言中说：“此书只算是研究西洋音乐作品的一把钥匙”。全书分三部份：一、主调学；二、谐和学；三、篇法学。一九二九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五月　在柏林完成《各国国歌评述》一书。该书分三编：第一编，中国国歌之评述；第二编，西洋国歌之历史；第三编，西洋国歌作品。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由中华书局印行。

五月十六日　在《醒狮》周报“海外通讯栏”发表《国人能力破产之可惊》。在文章中提出，他研究音乐的目的是“籍此以唤醒‘中华民族本性’，为抵抗外国文化侵略之工具。”

八月　在柏林完成《对谱音乐》一书。该书一九三三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八月三十一日　在柏林致书“少年中国学会”同志，附《王光祈对于会事进行意见书》。在意见书中，他认为：“若要打倒国内军阀之专横，须养成民众实力，所以我们应该先从事民众教育的实施。若要抵抗外国帝国主义之侵略，须促成东方民族之团结，所以我们应该先从东方民族联络入手。若要使中国民族有独立自尊精神，必须先养成民族文化以为其中心思想，所以我们应该努力研究学术。”他提议学会内部宜分三股进行：一、民众教育实施股；二、东方民族联络股；三、专门学术研究股。

十月十一日　根据“少年中国学会”第六届年会的决定，王光祈于是日填写了《‘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在“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竟抱何种主义”一栏内，他填写内容如下：“我相信民族主义，不相信国家主义，不相信共产主义；但认为在最近的中国，国家及共产两种运动皆各有其用处，只求不要过火，我都相对赞成。民族主义系以争求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为宗旨（汉、满、蒙、回、藏统称为中华民族），其方法系从‘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入手，以培养民族实力。至于将来中国政治、经济组织应采何种形式，则需待各派合作之大革命后，再按照彼时世界现状及趋势，与夫国民程度及愿望而定。此时不宜胶执己见，多立党派，减少国民对内、对外战斗能力。”

黄仲苏回忆说：“光祈于十四年十月间，接读第五届年会记录及附调查表格，则为之惶然，戚然，绕室疾走，筹划所以补救之道。所填表格至为周详，可供覆按，其用心之苦可想知矣”㊳。

十一月　在柏林完成《东方民族之音乐》一书。本书以英国人A·J·ELLIS所著关于"比较音乐学"的书籍为准，博采中国、德国、法国各种资料加以扩大和充实。特别详尽地收罗了亚洲各民族的音乐，加以比较研究。其体裁均先论乐制，后举作品。他在自序中说："我希望此书出版后，能引起一部份中国同志去研究'比较音乐学'的兴趣，若有人能作比较深的研究，则吾此书价值，最多只能当作一本'三字经'而已。"

本年，用德文写成《中国的音律体系》（未刊行）。

一九二六年（三十四岁）

三月　在柏林完成《音学》一书。他在自序中感叹"吾国今日学术，处处皆落人后。""有志之士，无不竞言西洋科学。只可惜所竞言者，尚多囿于'应用科学'一途。而对于一切学术所基之'纯粹科学'，则习之者反寥寥"，"此亦吾国学术界不思树本之一证也。"该书脱稿后，中华书局以"过于专门，恐无销路"，拒绝接受出版。总编辑左舜生深知他生活困窘，将书转托启智书局出版，但每千字只付三元稿费。为此，他写信给左舜生，说他患头痛症，常常是"一手握管，一手扶额"，"痛楚无力时，工作始废"。希望能提高稿酬，以维持生活。该书一九二九年九月由上海启智书局印行。

十月二十二日　完成《评卿云歌》一文。这是他对一九二一年三月被定为国歌的《卿云歌》的一篇评论文章。《卿云歌》由章太炎选词，肖友梅作曲。他认为这首歌就音乐而论，不合国民口味，就文字而论，不是国歌材料。颁布《卿云歌》为国歌，不外偶象二字。《卿云歌》是古典，章太炎是古典派学者，教育部是崇拜古典和古典派学者的代表。因此，一唱一随，就成了这个不合

民众心理、缺少平民精神的歌曲。他认为国歌的文字，需含下列三种要素。一、陶铸民族意识；二、须有确当理想；三、须使民众易解。后发表于《中华教育界》十六卷十二期。

十一月　完成《战后德国之经济》一书。一九二七年中华书局出版。他在该书中说："本书所述，即系德国战后八年以来之经济变迁情形，读者诸君阅此，必将发生一种感想，即是："凡有能力之人，无论别人如何压迫，他终久总是要翻身的。""没有充实的能力，则一切主张，皆是无用的空话。"

十二月二十一日　写成《教育家对中国现状应有之三大觉悟》一文。后发表于《中华教育界》第十六卷十一期。

是年　在德国《德累斯顿导报》用德文发表《音乐在中国的意义》。

魏时珍回忆："民国十五年，余自德返国，道经柏林，光祈即为余言音乐之妙，累日不绝。"他说："吾之志，在以乐为学，而不以乐为技。吾将偏究各国之音乐，考其嬗变，审其异同。吾国先民音乐之素养，视各国为深。吾尤将发湮抉微，张皇幽渺，使吾国音乐亦得与欧洲各国，分占一席，一洗外人讥我为无耳民族之耻㉟。

一九二七年（三十五岁）

二月　在《中华教育界》十六卷八期发表《音乐在教育上之价值》。该文阐述了音乐的教育功能和社会作用，指出了普及音乐教育的迫切性和具体措施。

四月一日　在柏林完成《中国乐制发微》（第一篇）。文中对当时西方某些学者提出的"中国乐制源自希腊"的观点，作了有力的驳斥。后发表于《中华教育界》第十七卷第八期。

四月二十八日　正式进入柏林大学音乐系深造。以音乐学作为主课，攻读达七个学期。他在《德国音乐教育》一文中讲："我在未入德国大学之前，即以柏林一位普通音乐教授补习；每星期学习提琴六点钟，如是者四年，寒暑不断。"此外还"常与彼邦大学音乐教授及'音乐学者'数人往还，受益不少。否则，一个未具乐理基础之人，跑到大学听讲，简直会不知道讲些什么。"

在柏林大学他师从霍恩博斯特尔、舍尔林、沃尔夫、萨克斯等教授。还曾师随柏林乐器博物馆馆长萨克斯教授学了三个学期的乐器学，并到乐器博物馆实习达一年半之久。为了更好地掌握视唱练耳的基本学理，他还师从柏林国家医院耳科主任研究耳朵、喉管解剖之学。

八月　法兰克福举行"国际音乐展览会"。王光祈约友人凌纯声，在会上演奏七弦琴，以介绍中国音乐于欧洲。

八月三十日　在柏林完成《德国音乐教育》一文。该文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德国音乐教育状况。内容包括：一、中、小学校音乐；二、私家音乐教育；三、大学音乐教育；四、社会音乐教育。文中特别详尽地介绍了他所在的柏林大学音乐系的情况。后发表于《中华教育界》十七卷四期。

九月十五日　完成《声音心理学》一文。声音心理学和音乐心理学，在当时尚属初兴科学。此文是我国音乐界学者在这方面的最早著述。

十一月七日　在柏林完成《中国音乐短史》一文。此文原为八月德国法兰克福所开之"国际音乐展览会"而作。全文对中国音乐的律、调、乐器、乐队、诗乐、剧乐、器乐及音乐思想均作了提纲挈领的介绍。表露出对中国古代音乐文化成就的民族自豪感。

是年　在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科学导报用德文发表《论中国音乐》。

一九二八年（三十六岁）

八月五日　在柏林译完《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本书译自德国一九二六年出版之《一八七一到一九一四年的欧洲内阁大政》。他在序言中说："大战以后欧洲外交局面虽然略有变迁，而列强在华形势则依然如昔，读本书不仅对于以往史迹完全瞭然，即对现在局势，亦将由此有所领悟也。"一九二九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九月二日　在柏林译完《李鸿章游俄纪事》。该书译自俄国沙皇时代国务总理维特伯爵之笔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十一月由东南书局出版。

本月　在柏林译完《瓦德西拳乱笔记》。本书系由庚子联军统帅瓦德西日记中译出，为研究八国联军和义和团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本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十月九日　在柏林译完《美国与满洲问题》。本书译自一九二六年出版的《德国战前外交文件汇编》。他在序言中说："美国与满洲问题，并非过去陈迹，乃系未来大事，尚望国人及早加以注意"。

本月　在北平《晨报》发表《国际三大经济新战线》。

十一月　在《中华教育界》十七卷七期发表《学说话与学唱歌》一文。这是一篇相当系统的关于人声发音原理和声乐基本常识的文章。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较早地介绍意大利美声唱法的记录。

本年　在国内发表的文章尚有《欧洲农业革命潮流》。载北

平《晨报》。

在国外用德文发表的文章计有：

《论中国记谱法》，发表在《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科学导报》上。

《中国耕地数千年的统计》，译自《北平经济半月刊》，发表在《法兰克福科学导报》上。

《吕利歌剧〈阿尔美德〉序曲研究》，载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研究报告书。

《论蒂博的声音艺术的准确性及其在十九世纪音乐复兴运动中的意义》，载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研究报告书。

一九二九年（三十七岁）

三月五日　在柏林图书馆内译完《三国干涉还辽秘闻》。此书译自柏林大学汉文教授O.Franke所著《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四年列强在东亚》一书。当三国干涉还辽之际，作者正在中国任驻华使馆译官。对当时各国纵横捭阖的手段，在书中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年七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三月十二日　在柏林图书馆写成《译谱之研究》一文，后刊载于《中华教育界》十七卷十期。本文主要对律吕谱、宫商谱、工尺谱的译法进行了探讨和试译。对国内许多学者的译谱主张和所译乐谱，作了广泛的对照和评述。

三月十三日　在柏林图书馆完成《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一书。本文曾在德国杂志《Sinica》上发表过。一九三三年二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七月　在柏林完成《翻译琴谱之研究》一书。在《导言》中

他指出："音乐作品是含有民族性的，欲创造国乐，则中国固有材料，万不能加以忽视。"吾国琴谱，写法不良，解释互异，实有加以根本整理之必要。""现在余以两月草成此文，可谓为时甚短，未曾浪费光阴。但在此留学期间，饱受经济压迫与功课逼促之际，而有闲心为此，亦殊不易。倘国内同志对于余之此项工作，能加以纠正补充，并多多从事翻译，以促进国乐之成立，则余将引为万分荣幸矣！"

八月三十日　在柏林图书馆译完《西藏外交文件》。本书共载文件十三篇，均译自英人 Sir Charles Bell所著《西藏之今昔》。一九三〇年四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九月二十日　在柏林完成《音乐与时代精神》一文。他在《导言》中说，他初入柏林大学音乐系时，该学期所研究为十六世纪两大音乐家Palestrina与Lasso之作品。教授未有一语及于音乐，向学生询问和辩论的尽是关于十六世纪政治、宗教之情形，以及哲学、美术之思潮等等，迨学生对于时代背景明瞭之后，始从事于该世纪音乐之研究。此种研究方法，给他极深的印象。他觉得在音乐学者中，将整个时代背景应用音乐研究，至今尚不多见，故将个人观察所得及欧洲学者研究结果写成此文。一九三一年二月刊载于《华胥社文艺论集》。

十月三十日　在柏林图书馆写成《德国成人教育》一文。该文着重介绍了德国"民众大学讲习班"和"民众图书馆。"文中提及他未肄业于柏林大学之时，曾在"纳生民众大学"听《比较音乐学》讲座，该班人数虽不甚多，只有十余人，但听时均甚专心，计讲六次，每次二小时，缴费六马克（约合中国大洋六角）。第一部份后发表于《教育与民众》㊲第一卷第五号。

十二月二十六日　在北平《晨报》发表《关于东铁问题之欧

洲舆论》。

本年　在德国用德文发表的文章计有：

《马丁·阿格里柯拉的德国音乐评论的研究》，载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研究报告书。

《论卡齐耶的小提琴艺术》，载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研究报告书。

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有关《中国音乐》的条目。

为《意大利百科全书》撰写有关《中国音乐》的条目。

一九三〇年（三十八岁）

一月　在《教育与民众》第一卷第六号发表《德国成人教育》（二）。

二月　在《教育与民众》第一卷第七号发表《德国成人教育》（三）。

三月　在《教育与民众》第一卷第八号发表《德国民众图书馆》。

四月　在《教育与民众》第一卷第九号发表《柏林国立各博物馆之组织》。文中详尽地介绍了柏林各博物馆组织：计有美术博物馆九种；学术博物馆十九种；故宫博物馆二种；他在文章最后一章说："吾国不欲进为现代世界文明强国则已，如其欲之，则对于设置博物馆一事，万不可缓。盖博物馆之利益，不仅是促进科学、美术，辅助国民教育而已；尤其是可以籍此减除一般市民之下等娱乐，并可以由此培养国民好学风气。"他感叹现在吾国"只有好财风气，""没有好学风气。"以"愚蠢脸皮"和"乞怜眼睛"与人相见，丧尽了"黄帝祖宗与夫历代先哲之德。"

在北平《晨报》发表《伦敦海军会议之成绩》一文。

五月十九日　在柏林图书馆译完《库仑条约之始末》一书。他在序言中说："外蒙问题至今为中俄两国主要纠纷之所在，推原祸始，实以库伦条约一役为起点。凡留心蒙古问题者，对于此种最有关系之史料，万不可漠然置之也。"本年十一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本月　在《教育与民众》第一卷第十号发表《德国民众剧院》。

六月二十六日　在北平《晨报》发表《德国金融事业之今昔观》。

七月二十一日　在柏林图书馆完成《英、德、法读音之比较》一书。一九三一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九月十四日　在上海《生活周刊》第五卷第四十期发表《西洋人与中国戏》（一）。

九月二十一日　在上海《生活周刊》第五卷第四十一期发表《西洋人与中国戏》（二）。

十一月十日　在柏林图书馆音乐部完成《西洋音乐史纲要》一书。在卷首《提纲挈领》中说："我们无论研究任何学问，均应以九牛二虎之力从事，始能稍有收获。大凡素不研究学问之人，根本不知道有所谓问题，若研究学问而不深，则亦不知道问题有如许之多。西洋学者研究学问，往往对于一个极小之问题，不惜以毕生之精力从事。在旁观者观之，固属极为可笑，但西洋学术之进步，即全在于此。"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年　在国外用德文发表的文章计有：

《关于席德迈尔的德国歌剧（先莫扎特时代）的研究》，载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研究报告书。

《论中国诗学》，载《法兰克福科学导报》。

一九三一年（三十九岁）

二月二十六日　在柏林图书馆完成《中国音乐史》一书。他在自序中说："本书十之八九系余个人心得。""音乐作品与其他文学一样，须建筑于'民族性'之上。不能强以西乐代庖"，"而最能促成国乐产生者，殆莫过于整理中国乐史。""先民文化遗产，最足引起民族自觉之心，音乐史亦先民文化遗产之一也。""余留德十余年，皆系卖文为活"，"本书一点成绩，亦系十年来孤苦奋斗之结果。""西洋汉学家对于吾国近时学人，类多轻视，谓其缺乏普通常识，不解治学方法。""余甚望国内同志能一洗此种奇耻大辱。"一九三四年九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三月二日　在柏林写成《德国对失学国民的救济》，后发表于上海《生活周刊》，六卷十六期。

同日　写成《留学与博士》。后发表于上海《生活周刊》六卷十七期。

五月二十七日　写成《以争立国与以让立国》一文。后发表于上海《生活周刊》六卷三十一期、三十二期。

七月二十一日　在柏林图书馆完成《西洋名曲解说》一书。一九三六年二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八月下旬　由于患胃溃疡和贫血的病，呕吐晕昏以至卧床不起。后赴柏林国立大学医院诊治，卧病该院四旬。时值暑假，一切医药费用，完全自理。他说："余虽贫穷，但历来卖文之资，尚可孤注一掷"，"不向德国医生作乞怜之举。"

夏　周太玄自法归国过德时，在车站会晤王光祈。周太玄回忆"他的精神依旧，抱负不俗，认为'少中'运动仍应继续。"

十一月五日　在柏林写成《东北问题与国际形势》一文。后发表于上海《生活周刊》六卷五十一期。他在文章中说：九月十八日日军占领沈阳之时，“余卧病异邦，闻此噩耗，百感交集，殆难言喻”。“每日皆有一位卖报女郎，按时入院售报。同室各位德国病人，看了此项消息后，多围立余之床前询问，并互相讨论，一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终不可免也者。”

十二月二十九日　在柏林写成《柏林病院四旬记》。后发表在上海《生活周刊》七卷三期、四期、九期、十期。

一九三二年（四十岁）

一月一日　在柏林写成《战机尚未成熟》一文。文章认为，日本强占满洲，打破太平洋均势，行将惹起日、俄、美战争，但战机尚未成熟。文章感叹说：“令余终日寝食难安者，即吾国因‘均势’二字，得以苟延残喘，将来亦随‘均势’二字呜呼哀哉！日本武力吞并吾国，是急性症亡国；列强经济共管中国，在慢性症的亡国。”他希望国人能从各方面积极准备，为挽救祖国的危亡而努力。后发表在上海《生活周刊》，七卷十二期。

一月二日　在柏林写成《御武之武力》一文。“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以此案诉诸国联，以待公理之裁决。”王光祈在文章中认为：“国联派遣委员到满调查之举…是在考查中国方面是否有违背条约之事，彼等实有一鼻孔出气之关系，我国欲求得如何公平之结果，恐终属梦想。实际上欲求根本解决，仍非有御侮之武力不可。”后发表在上海《生活周刊》，七卷十三期。

二月二十五日　在柏林图书馆完成《西洋话剧指南》一书。一九三九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

三月三十一日　致函中华书局舒新城，痛感强敌压境，困难

当头，拟编译一套《国防丛书》，以备国人抵御侵略之参考。

四月二十二日　在柏林图书馆完成《空防要览》一书的翻译工作。在序言中他说：“余本以研究音乐为终身职业，但鉴于此次沪变之被敌蹂躏，而自身远处异国，不能稍尽抵御之责，至以为愧。乃发愤收集西洋国防材料，于课余之暇，从事译述，以备国人参考。盖有国无防，实际等于亡国。若自己不能防而冀他国为之代防，更是无耻之尤。因自御外侮一事，乃是一个民族要求生存权利时应尽之最低义务故也。”该书一九三五年三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五月四日　在柏林写成《国防问题》一文。他在文章中说：东北义勇军与日军血战，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使日本暴军，疲于奔命，不能安枕，表现出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的决心和牺牲精神。他提出如果能够改善各地的团练，加强教育训练，则“内乱不足病，外患不足畏矣！”后发表于上海《生活周刊》，七卷二十六期。

五月六日　在柏林写成《一位德国奇士——捐款中国以征服欧洲》通信稿。后发表在上海《生活周刊》，七卷二十四期。

七月七日　在柏林图书馆译完《经济战争与战争经济》。本书译自海尔法里耶所著之《世界大战》一书。他指出：“吾国经济组织与德国相异，因此，书中所叙各种，不必尽能应用于吾国。但‘举一隅可以三隅反’，吾人固可以此得益不少，以作他日国防事业之准备也。”一九三三年二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七月十八日　邵循正先生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对王光祈译著《西藏外交文件》一书中引述乾隆御制《十全武功记》的错讹，提出批评。

八月一日　在柏林写成《防空组织》一文，后发表在《上海生活周刊》，第七卷四十四期。

八月三十一日　在柏林写信致邵循正先生。信中说："仆之专业系在研究音乐历史，惟以国命危殆之故，间亦拨冗翻译外交史料七种，以供国人参考。""译述之时，系在柏林图书馆中…非如国内编著之能多得材料，详细斟酌者可比。更加当时个人处于经济万分压迫之下，健康十分受损之际，疏误之处，势所难免。""仆生平为人，最喜苯干，近又不自量力，为中华书局编译《国防丛书》，此种不度德、不量力之勇气，势将更使先生齿冷。虽然仆宁愿饱受他人'齿冷'之辱，而不愿自己陷于血冷之境也。国难方殷，尚希为国珍重！"后载于天津《大公报》。

九月二十七日　邵循正先生在北平致王光祈。信中说："先生著作甚富，脍炙人口，瑕不匿瑜，疵不掩醇。《文副》编者谓先生学行之笃，远非时辈所及，仆聆之神往"，"编译《国防丛书》，亦当务之急，何日脱稿，先读为快，深望为学珍重，敬候起居不一！"后载天津《大公报》。

十一月一日　受聘波恩大学东方学院，担任中国文艺讲座。并在该校旁听教授席德迈尔的课程。

一九三三年（四十一岁）

二月七日　在莱茵河畔波恩大学译完《国防与潜艇》一书。一九三五年一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五月二十二日　在莱茵河畔波恩大学译完《德英法战时税收》一书。本书为德人客劳斯所著。他在序言中说："本书内容翔实，至今犹为研究欧战时德、英、法财政问题最善之书。吾国财政情形，虽与上述三国相异，但书中可供吾国之参考者亦复不少。因译之，以饷国之留心国防问题者。"一九三四年九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六月十五日　译完《近五十年来德国之汉学》。此文系柏林大学汉文教授、著名汉学家海尼士所作。载《新中华杂志》一卷十七期。

九月　魏时珍在《我所能记忆之光祈生平》一文中说："民国二十二年九月，余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约，复入德求学，因与光祈再遇于波恩。"是时，光祈"为波恩大学讲师，而头已秃，体已衰矣。光祈与余约，每夜七时，来余寓笑谈，八时即去。时当来，光祈已来，时当去，光祈即去，多留一刻，亦不可。""一夕，光祈告余……十年以来，余成乐书已十余种，其余以糊口而著述者亦十余种。当余执笔时，脑辄作痛，余以左手抚头，右手作字，至痛楚无力时，工作始废。世或有讥余译著不精者，使其知余之生活为何似，将亦不忍苛责也。"

一九三四年（四十二岁）

二月十九日　光祈在波恩致函魏时珍。信中说："本月十五日，有一日本教授在此讲'满洲国与日本'，附以有声影片。此间同学，交涉阻止无效，乃与东方语言院院长接洽，于讲演之前，由该院长说明吾辈反对经过之情形，并朗颂吾辈拟就之抗议书一遍。读毕，吾辈全体同学退席，以表示抗拒之意。……并暗中雇一德人速记其演词，现已寄往柏林使馆，请其速向德国外交部抗议矣。将来葛廷根方面，恐不免同样事件之发生，尚希预防为荷。"

四月十六日　本年一月至三月，在柏林由中国政府、东亚美术学会、普鲁士美术学院三方合作，在普鲁士美术学院举办了"中国近代绘画展览会"，参观之人，将近十万。各种报刊，均有评论。王光祈选译了若干种具有代表的意见，题为《德人对于



一九三四年中国国际图书馆出版之王光祈博士论文《论中国古典歌剧》

（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藏书）

中国绘画之批评》，寄回国内，后发表于上海《新中华杂志》。

五月一日　致函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诸先生。后发表于《音乐教育》二卷八期。

六月　以《论中国古典歌剧》一文，荣获波恩大学哲学（音乐学）博士学位。该文由日内瓦中国国际书店出版。

九月　沈怡至波恩促其归国，据沈怡说："他的经济状况，一时还不容许他立即回国，至少还须二、三年工夫，才可以积起一笔回国的川资。"王光祈写信叮嘱沈怡："不必为他的事情奔走，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德国，随时有著作和国人相见，并非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可比。"

一九三五年（四十三岁）

七月十一日　在波恩大学将自己十五年来在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北平《晨报》上所发表的关于外交、政治、经济、教育、学术、游记等文章，删存二分之一，共六十四篇，约二十余万言，编为《王光祈旅德存稿》，作为国内研究时事问题的参考。该书一九三六年二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他在自序中说："民国九年四月，赴德留学，……是时，余尚未习德文，故最初一、二年之通信，深得同学魏时珍博士供给材料之助。""民国十二年以后，遂决意放弃研究经济之愿，而改习音乐历史，"

"先后成书三十余种"。

七月二十六日　致书魏时珍。说他自己不是不想回国，苦于国内无相当位置，故暂处国外，以译著事业，报效祖国而已。信中还说到，本年四月二十日蒋介石曾电询柏林使馆，略云"闻王君光祈绩学苦行……。如愿回国，当图借重"。使馆曾征询他的意见，他提出"如有相当位置，自愿回国，报效祖邦。如能先以位置相示，以便自揣，能否胜任，再行决定行止。"

八月二十六日　写成《千百年间中国与西方的音乐交流》一文。亲笔签名，赠送他的老师席德迈尔教授。该文发表在波恩出版的纪念卡勒教授专刊上。

八月三十日　在波恩大学完成《未来将材之陶养》一书。他在序言中说："书内所言，系针指上次欧战行军之各种弊端，其情形不必尽与吾国相合。但吾国现当国防万分紧急之秋，未来大战，不久终将临头；为避免重蹈他人错误起见，殊有取而参考之价值也。"

十一月十二日　在莱茵河畔波恩大学译完《德国工役制度》一书。一九三六年六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年　还完成有下列著述和文章：

《中国的道白戏剧和音乐戏剧》。一九三五年柏林精神工作出版社出版。

《西洋歌剧指南》。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正在印刷中，是否出版，不详。

《王光祈音乐论文》第一集。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正在印刷中，是否出版，不详。

一九三六年（四十四岁）

一月十二日　患脑溢血症，下午八时客死波恩医院。王光祈逝世后，波恩大学立即以校长毕脱罗斯基名义向全校教职员发出讣告。

一月十八日　波恩大学举行追悼会。波恩大学东方学院院长、教授卡勒博士说："他是一个很静默稳重的人，只有很接近地去细细认识他，方可以了解他的伟大。""他努力介绍西方音乐的精华到中国去，并且运用西洋的方法去整理那至今还未有人碰过的材料；在这一方面，他可以算是第一个前驱者。"波恩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希德玛博士说："他把握住了西欧，特别是德国方面研究音乐的科学方法与途径，由此设法与他故乡的音乐与戏剧的艺术相接近。这居然给他做到了；他是一位受有严格教育的音乐学家。"

二月二十八日　上海《时事新报》刊载《王光祈先生之哀耗》。略谓：王光祈为"吾国唯一之音乐史学家，平生著作甚富，治事亦极精练，不幸骤于上月在德逝世，享年仅四十五岁，噩耗传来，国内学术界咸为震惊，无论知与不知，同深悼惜。"文中还提到王光祈"于去年得有波恩大学博士学位，国人之以音乐史考得是硕学位者，王君实为第一人，其所提论文《昆曲研究》(即《论中国古典歌剧》)，深为德国学术界所赞赏。""一代英才，竟客死异域，曷胜痛惜！"

三月一日　中华书局舒新城在《王光祈旅德存稿·自序》后记："王君此书，去年九月寄到，今年二月，排校完毕，正待付印，王君一月十二日在德逝世之噩耗已传至上海，而此书已成遗著矣！王君之死，实为我国学术界一大损失"。

三月十五日　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召开追悼会。到会者有宗白华、徐悲鸿、田汉等三十余人。宗白华主持追悼仪式。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代表到会致词说：“王博士不仅是一个学者，并且也是一个沟通中德文化的一个重要人物。”蔡元培在《王光祈先生追悼会致词》中对王光祈的一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对王光祈壮年辞世，不克进展所长，表示十分婉惜和悲恸。


京學術界
昨日追悼王光祈

南京追悼王光祈消息

追悼会上的画像为画家徐悲鸿所作。

同日　上海假市中心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举行了追悼会。舒新城致词，略谓：“王君留德十六年，从未受公家或私人方面丝毫津贴，平日生活，纯赖鬻文维持，此种艰苦卓绝之伟大精神，洵足为现代青年表率”。国立音专校长肖友梅因病体不适，由黄自教授代表在会上发表了讲话。黄先生扼要地介绍了王光祈在音乐上的贡献，特别认为：“王君所著《中国音乐史》及对于普及音乐之努力，为最有不可磨灭之价值”。

四月十九日　成都在文庙西街成公中学举行了追悼会，参加者有李劼人、刘大杰、周太玄、魏时珍等。成公中学是当年四川高等学校分设中学的旧址，王光祈的母校。在追悼会的同时，刊

行了纪念专刊，“其中有一篇《公祭王先生启》苍凉凄楚，传颂一时。”

七月　全部遗物由同济大学留学生江鸿从波恩寄回上海，存放德、奥、瑞同学会。

八月十五日　在波恩火化遗骸。

十月　骨灰运回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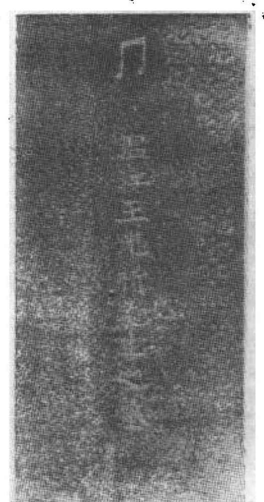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八年

由于李劼人的请托，沈怡由上海将骨灰带至成都，存放“菱窠”李劼人家。

一九四一年

七月二十五日　冼星海在《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我们不能忘记一位埋头苦干死于柏林的中国音乐理论家王光祈，他遗下给我们许多宝贵的著作和翻译，推进了新音乐运动的发展。他的刻苦耐劳是我们从事中国新音乐的模范”。

是年　由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等同窗故友，将骨灰安葬于成都沙河堡李劼人住宅“菱窠”附近之周太玄私人墓地上。墓穴上覆大青石碑一块，周太玄亲笔题写“温江王光祈先生之墓。”



周太玄题写的王光祈先生墓碑

一九八三年

十月　经有关领导单位批准，将墓碑迁于四川音乐学院校园内，并建立了碑亭。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亲笔题写了“王光祈碑亭”横匾。左右楹联由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老革命教育家张秀熟撰文，著名书法家李半黎书写。楹联如下：

革命先驱　少年中国

蜚声寰宇　音乐名家



座落在四川音乐学院内的“王光祈碑亭”



一九八四年六月在成都召开的"著名音乐学家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

注释

① 《温江县乡土志》，宣统元年仲夏镌。

② ③ ⑨见戴尧天《王光祈温江故乡生活志略》。

④ 李劼人：《诗人之孙》，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同知"是可以补实缺的官。

⑤ ⑥ 《石室纪事》，甲子五月二日成都联合县立中学校编。

⑦ ⑧ 见王光祈《致黄霭女士》，载《少年中国》一卷二期。

⑩ ㉒ 见周太玄《王光祈先生与少年中国学会》，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⑪ 《夔州杂诗》，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⑫ 《访问魏时珍教授谈话记录》，一九八三年。

⑬ 原诗稿存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崔宗复处。

⑭ 《王光祈致恽代英》，载《少年中国》二卷十一期。

⑮ 李劼人：《自传》，载《李劼人文集》第一卷。

⑯ ⑰ 周太玄：《关于参加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载《'五四'时期的社

团》（一）。

⑱ 两首诗均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第二版。

⑲ 傅斯年：《追忆王光祈先生》，载《王光祈先生纪念册》，文海出版社。

⑳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二章《'五四'运动与少年中国学会》。

㉑ 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载《少年中国会务报告》第三期》。

㉓ 李劼人：《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所由成立》，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㉔ 李璜：《我所认识的王光祈》，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㉕ 张秀熟：《'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回忆》，载《'五四'运动回忆录》。

㉖ 李劼人：《'五四'追忆王光祈》，载《川西日报》，一九五〇年五月四日。

㉗㉚ 黄仲苏：《哀辞》，载《王光祈先生纪念册》，文海出版社。

㉘ 《毛泽东致陶毅》，一九二〇年二月，载《新民学会通信集》（一）。

㉙ 《毛泽东致周士钊》，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四日，载《新民学会通信集》（一）。

㉛ 王光祈：《旅德存稿》。

㉜㊱魏嗣銮：《我所能记忆光祈之生平》，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㉝ 王光祈：《中国人生活之颠倒》，载上海《学生杂志》九卷七号。

㉞ 王光祈：《旅德存稿》《自序》。

㉟ 黄仲苏：《王光祈与少年中国学会》，载《王光祈先生纪念册》。

㊲ 该刊系江苏省立（无锡）民众教育学院、劳农学院编辑出版

后　记

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努力，这本小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访问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同志。九十岁高龄的许老，在西山宅邸热情地接见了我们，实事求是地为我们介绍了王光祈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的事迹，使我们十分感动，深受教育。全国音协名誉主席吕骥同志、副主席赵沨同志、四川省政协主席杨超同志、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秀熟同志、在百忙中多次和我们倾心交谈，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王光祈生前挚友、四川大学魏时珍教授、北京大学宗白华教授以及中央音乐学院廖辅叔教授、四川师范学院崔宗复教授，除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他们记忆中的王光祈外，还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文化部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上海辞书出版社、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温江县政协和县志办公室，为我们查阅资料提供了方便。我们还参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彭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义彬同志有关研究王光祈的文章和著述，吸收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还得到人民音乐出版社有关负责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使得这本书得以出版。

在此，谨向以上同志和单位，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本书照片均为孙维民同志翻拍或拍摄。

作　者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